



吉庆街艺人中，最有激情的是几个摇滚组合。每当摇滚乐手们上场时，那震撼的场面往往吸引众人的目光。食客们经常起身与歌手们一起飙歌，沉醉其间。图为2011年9月3日，摇滚组合杨先高（左）和阿坤（右）的卖力演唱赢得了外国客人的阵阵掌声。

杨先高，孝感人，擅长沙锤、摇滚歌曲；阿坤，真名于坤坤，河南人，擅长吉他弹唱、摇滚歌曲。杨先高块头大，爱出汗，往往一曲下来，就满头大汗了。

吉庆街很有几个摇滚歌手，每人擅长一种乐器，流行的摇滚歌曲都唱得烂熟。摇滚歌手以组合的形式登场，但每天根据情况会有不同的组合，可能两个人一组，也可能三四个人一组。摇滚歌手一旦开唱，就停不下来，串烧歌曲一曲连着一曲，客人若只顾着兴奋，最后看到账单可能会咋舌。

每天晚上12点按照要求停止演唱后，这些摇滚歌手一般会转移到酒吧等场所继续献艺，直至凌晨。

（图/文 周国献）

目 录

编委会名誉主任：谭仁杰 彭富春
陈邈馨

顾 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心耀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陆永初 涂文学 萧志华 彭小华
董宏猷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编委会副主任：陈 光 朱向梅
杨 华 李修文
陈国方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尹 鹏 甘 琼 龙桃仙 吕照清
刘重武 邹仕芳 张 霞 陆建军
陈立新 姚四平 曾艳红 窦 梅
潘红莲

主 编：陈国方
副 主 编：周 敏
本期责任编辑：华 蕾
编 辑：张川蕾 游 迎
封 面 设 计：王 鹏

城市之根

<<< <

4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新馆选址建设侧记 / 郭 剑

扶贫路上

<<< <

8 扶贫战场再冲锋 / 张宗明(口述) 李 明(整理)
11 用脚步传递党的温暖 / 燕 侨

精工匠心

<<< <

14 初心为炬 砥砺前行 / 朱红西

山有赏门

<<< <

19 盛世育桃李,佳文泽后学——忆刘盛佳教授
/ 龚胜生
26 忆中南民族学院干部轮训部 / 李大杰

武汉文史资料

WUHAN CULTURAL & HISTORICAL DATA

CONTENTS

2020 年第 9 期 (总第 335 期)

委员天地

<<<< <

- 28 一名政协委员的体育人生 / 孔 军
33 我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平凡经历 / 邓小妮

往事漫忆

<<<< <

- 36 追思侯杰昌先生 / 柯亨玉 文必洋 李德识
40 抗美援朝战争中我的片断往事 / 闵永安
47 后湖街道, 我的防汛责任区 / 汤维钧

史海钩沉

<<<< <

- 50 民国时期的武昌沙湖讼案 / 李焱胜

都市史话

<<<< <

- 55 明清时期黄陂木兰传说的发展和演变 / 张 静

楚风汉韵

<<<< <

- 59 “湖北三老”与湖北现代美术教育 / 李瑞洪 张明建

主 管: 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 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 《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 《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 CN42-1056/K

印 刷: 武汉市仁达印刷厂

出版日期: 每月 28 日

定 价: 8 元

地 址: 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 430010

电 话: (027) 82220667

(027) 82220669 (传真)

E-mail: whzxwszl@163.com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新馆选址建设侧记

◇ 郭 剑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新馆于2019年元月正式开馆，基本陈列“江汉泱泱 商邑煌煌——盘龙城遗址陈列”于2020年5月18日被评为全国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其中，遗址博物馆隐匿于公园之中，又与遗址本体相呼应，成为本次获奖的亮点之一。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新馆的建设并非一帆风顺，二十余年间，几经周折，从1993年开始提出商城博物馆的规划思路，一直到2019年博物馆才正式运行开放。

（一）

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遗址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愈发突出。为保护好盘龙城遗址，充分发挥

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1994年，武汉市组织完成了《盘龙城遗址风景区保护开发规划》，划出了10.94平方公里的文物保护区和风景区控制范围，在盘龙湖北岸童家嘴附近规划商城博物馆，包括中国之城博览馆、中国宫廷展览馆、商代礼乐娱乐馆、出土文物展览馆等，不过“还需进一步作出详细规划，严格按规划实施，采用现代化管理手段”。最终，此规划未获相关方面审批通过，因而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在当时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盘龙城遗址保护范围图上，其保护范围只有盘龙城宫城周边1.1平方公里的面积。

21世纪初，随着黄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的成立，盘龙城周边道路建设、房地产开发项目如火如荼，更加剧了盘龙城遗址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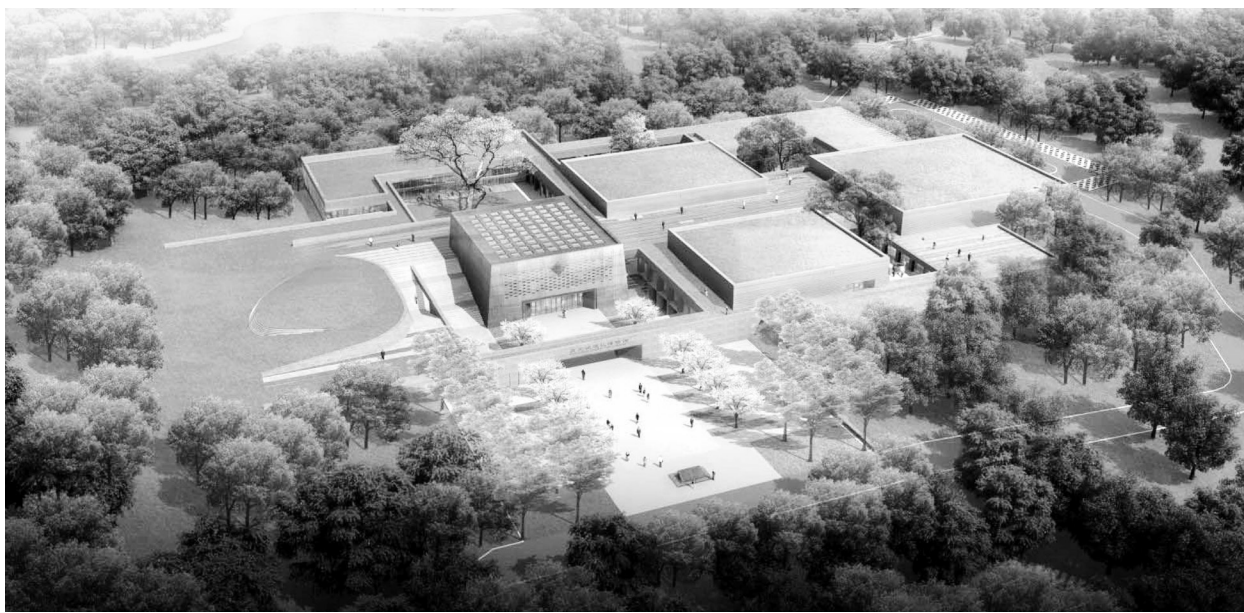
与博物馆建设的紧迫性。此时，湖北省博物馆将盘龙城遗址移交武汉市管理。为摸清文物埋藏情况，2001年，武汉市组织了一次大型考古勘探，确定了盘龙城大遗址的性质和商代文物分布范围。2002年年初，武汉市召开了“商代盘龙城与武汉城市发展研讨会”，邀请来了国内众多著名专家学者，经过充分论证，基本达成盘龙城遗址是“武汉城市之根”的共识。会上，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邹衡先生即指出：“盘龙城是研究我国早期城市和国家形态的一只‘麻雀’。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他还说：“盘龙城不仅是武汉市的招牌，同时也是湖北省的招牌，应该将盘龙城出土的精美文物展示出来。”与会领导、专家均认为应根据经济发展形势，尽快编制《盘龙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保护好盘龙城遗址这一“武汉城市之根”，建设一座规模适当的遗址博物馆以展示出土文物。

为推进盘龙城遗址保护工作，武汉市文化局于2005年委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编制《盘龙城遗址保护总

体规划》。《总规》于2007年6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批复中对遗址公园入口及博物馆建设给出了具体意见，“遗址公园入口的设置应充分考虑遗址形制和遗址展示的需求”，建筑规模建议控制在3000平方米内。同年9月，根据国家文物局相关修改意见，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明确了博物馆位于遗址公园北入口处，即当时规划的主入口，位于公园北侧、巨龙大道南侧下集村内，遗址博物馆近期建筑面积约为3000平方米，含遗址展陈、管理、考古研究中心、游客中心，可在规划中远期按实际需求适当扩建，建筑控高8米。2009年4月，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荆州城墙等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规划的批复》，其中有《盘龙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因此该规划具有了法律效力。

（二）

当时的选址思路主要是考虑保护遗址的完整性，减少建设中对遗址可能的破坏和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新馆效果图

扰动，让博物馆选址离开遗址本体，选在建设控制区。这一选址在盘龙湖北侧的建设控制地带内，与遗址核心区的宫城直线距离有2公里。另外，该选址地点涉及搬迁居民达607户之多，上千余人，工程量浩大，实施难度大。

博物馆选址十分重要，既要有利于遗址的保护，又要便于文物的展示，到底选在哪里合适呢？为此，时任湖北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沈海宁同省文物局副局长黎朝斌、办公室主任王风竹特意来到盘龙城遗址现场调研，沈海宁甚至到了大邓湾民房屋顶眺望查看合适选址。

2008年11月14日，武汉市文化局邀请省、市规划设计及文物考古单位的专家，在盘龙城遗址现场召开“盘龙城遗址博物馆选址专家会”。与会专家听取了我院汇报并考察现场后，就遗址博物馆选址发表了广泛意见，认为《总规》中的博物馆选址存在的问题是博物馆与遗址核心展示区距离过远，不利于观众参观。从盘龙城遗址布局、交通通达度、社会效益、遗址公园管理运行、博物馆建设动迁难度等角度考虑，认为遗址博物馆建设地点选择在盘龙大道东侧、大邓湾至江家湾之间地带为宜，且建议遗址博物馆建设规模一次性规划，建筑面积控制在8000平方米。根据专家意见，武汉市文化局拟订了《关于确定盘龙城遗址博物馆馆址的请示》，呈报省文物局，获得批复同意。遗址博物馆的位置就此确定。

2013年，我院向国家文物局上报《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2012—2025），并于2015年上报《关于盘龙城遗址博物馆建设方案及选址的请示》，其中新馆选址及体量较《盘龙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07—2025）有所变更，均未获国家

文物局批准。为此，武汉市政府专门组织了对盘龙城遗址博物馆设计方案的讨论，仔细研究了国家文物局关于博物馆选址意见后，由我院负责协调考古单位、设计单位等各方补充了遗址博物馆现选址区域的详细考古勘探报告，修改了博物馆概念方案，并组织编写《盘龙城遗址博物馆选址报告》。

考古工作是编制选址论证报告的基础。论证报告的内容之一就是补充遗址博物馆选址区域的考古勘探报告。2012年9—12月，我院联合武汉市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对盘龙城遗址一般保护区进行全面勘探。2015年3—4月，为配合此次博物馆选址工作，我院委托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完成选址区域的考古勘探报告。张昌平教授带领其研究生团队对新选馆区建设范围进行了考古勘探，根据前后勘探情况已确认博物馆建设区域无重要遗存分布。小王家嘴位于博物馆现选址区域东侧，不属于选址建设范围，结合以往的勘探成果，张昌平认为此处应为盘龙城商代墓葬区。考虑到博物馆建设施工影响及今后周边遗址展示需求，决定对其进行发掘，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后，我院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共同对小王家嘴进行发掘，发掘面积约600平方米，发现商代墓葬21座、灰坑8个、晚期墓葬5座。2016年9月，又在博物馆建设区域南侧的大邓湾岗地发掘了6座明代墓葬。这些成为盘龙城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材料，被及时吸纳进了新馆展陈体系之中，成为博物馆展览的一部分。

2015年11月，湖北省文物局再次向国家文物局上报《关于盘龙城遗址博物馆选址和体量变更及设计方案的请示》，12月，获国家文物局原则同意。博物馆最终选址在遗址公园西侧的大邓湾。

(三)

根据国家文物局批复意见,我院组织中南建筑设计院对博物馆建筑方案进行调整优化。经过优化,博物馆建设方案中建设规模总用地面积4.96万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1241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由最初的25500平方米缩减至1631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3390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2920平方米。建筑高度调整至9.9米,容积率0.33,建筑密度25%。博物馆设计采用建筑景观一体化的思路,将建筑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消隐了建筑体量。建筑设计将“城”“台”概念与自然坡地巧妙结合,建筑自身既是大地景观又是观景台,与遗址核心区产生轴线关系、景观对话。观众登上建筑屋顶的观景平台,遗址尽收眼底。展厅内的景观视窗联通室内展览与室外景观,透过二展厅的玻璃窗可与博物馆建筑东侧的小王家嘴遗址对视,并可远眺至遗址核心区的杨家湾岗地,实现了博物馆现代展览与古代遗址的对话。建筑体块底部的仿土墙,围合公共仪式厅、基本陈列厅与庭院,抽象诠释古代“城”之意境:“方正”“围合”。通过入口庭院、门厅、公共长廊将四个展厅有机结合,是一种有分有合的布局方式。

遗址博物馆的功能主要包括了:1.展示功能,包括基本陈列厅、临时展厅、公共仪式厅、观众体验活动区、4D影厅级学术报告厅;2.考古研究部分,包括文物库房、标本室、文物修复室、图书档案室以及湖北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3.管理及后勤部分,包括办公管理用房、安全消防中心、设备用房、职工食堂等。

建筑方案确定以后,2016年1月,市

政府明确将该项目定位为国内一流的集智慧博物馆和绿色三星建筑于一身的遗址博物馆,黄陂区政府为博物馆建设主体责任人,武汉地产集团为代建单位。黄陂区政府积极作为,很快筹集了建设所需资金。作为本地国企,武汉地产集团有博物馆建设的经验,先后代建过我市中山舰博物馆、辛亥革命博物馆等博物馆建筑,也曾多次获得鲁班奖等国内建筑行业最高奖项。项目通过招标,由浙江建工集团为博物馆建筑施工单位。武汉市领导十分关心博物馆建设情况,时任副市长刘英姿多次到盘龙城现场调研,并召集多方会议协调施工问题。确定博物馆外立面材质时,刘英姿副市长甚至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将原本概念方案中的暖色调GRC混凝土装饰板/石材、铜饰面铝合金蜂窝板的材质属性,调整为黄砂岩、紫铜饰面铝合金蜂窝板的搭配,同时主展厅外立面也由概念方案中的铜饰面铝合金蜂窝板改为黄砂岩材质。调整后的博物馆建筑仿土墙色彩干净简洁,符合游客的观感。

这一期间,我院也在为博物馆建成后的展陈开放积极准备。一是加快博物馆展陈方案的撰写,二是积极准备文物,三是招标联系展陈形式设计单位。为借鉴同行博物馆项目的管理经验,我院还组织项目团队,先后调研了阖闾城遗址博物馆、鸿山遗址博物馆、良渚博物院等国内相关项目。

2018年6月,盘龙城遗址博物馆建设项目荣获中国城市科学院颁布的“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证书”。2019年元月正式开馆。2020年5月,盘龙城遗址博物馆基本陈列荣获全国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郭剑: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保管陈列部助理馆员)

扶贫战场再冲锋

◇ 张宗明（口述） 李明（整理）

我是一名军转干部，在部队先后6次荣立个人三等功，曾多次指挥和参与湖北地区的抗洪抢险和处置突发事件战斗，获得军内外一致好评。2014年，我服从部队安排转业到地方工作，任武汉四新生态新城管委会土地管理局副局长。2018年3月，我主动请缨担任江夏区山坡街群星村扶贫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在农村，我一扎就是两年多，用村民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效益，交上一份份亮眼的扶贫成绩单。

群星村是一个典型的以老弱病残为主留守的“空心村”。有1231人的村子里近七成是老年人，贫困户人口99人中残疾人就多达20人，另有200多人还处于贫困边缘地带，无产业、无特色、无动力、无劳力，像扎进骨髓的刺一样成了该村“穷根”的代名词。刚驻进村，我就感觉到了这个“第一书记”肩上的责任与分量，暗暗下定决心，

不将这里的“穷根”拔掉、让老百姓过上富足的生活就绝不收兵。

启动村“两委”引擎，助力村民脱贫致富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把第一书记的“书记”二字看得很重，书记是班子的领头羊，带不出一个强有力的班子，就是书记的失职。

在汉阳区对口帮扶山坡街的21个工作队中，我是最先提出“党建+扶贫”的人，也是把提升村“两委”内生动力作为头等大事抓得最紧的人。以前，我作为普通扶贫干部，隔一段时间就来驻一次村，但我发现，村党支部很少组织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想让村民党员参加活动竟然还需要花钱去请。担任第一书记后，我着手对群星村党支部进行手把手帮带，提出“必须落实党组织制度，必须强化党组织功能，必须发挥党员作用，

必须拓宽党建引领渠道”的思路，邀请汉阳区委直属机关工委作为党建帮带单位，对抓好村党支部的党建工作进行规范指导。同时，还联系了汉阳区几家区属企业，到群星村开展联合支部主题党日活动，通过现场观摩会、产品推介会等形式，集智攻关破解脱贫难题，为群星村的养殖业逐步打造出“电商云平台+实体销售”的村企采购链条。如今，党建引领扶贫模式已然成为群星村特色品牌在全区推广。为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思路，我还把村里几位老兵党员组织起来，成立“老兵党员工作队”，让他们在脱贫攻坚战场上宣扬党的声音，参与村党支部建设，化解村民矛盾。正如65岁的队员张名珍所说：要像当年在部队那样，积极参与党的建设，参与村子建设，为脱贫攻坚贡献老兵一份力量。

多为村民办实事，积攒信任

对我来说，刚驻村时最大的困难是村民对我这个第一书记的不信任，认为我来这里只是挂个名，用不了多久就会像其他人一样悄悄走了。谁也没有想到，我在这里一干就是两年多，而且还没有走的迹象……

刚到村里时，群星村进村的道路还是泥巴路，村里人不愿走出去，外面的人更不愿走进来。我决心突破村子基础设施“破、烂、差”的障碍，把重拳打在村民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上。于是，“村湾亮化工程”的部署图在我脑中逐渐清晰起来。借助汉阳区帮扶单位的力量，按照“一年亮路、两年亮湾、三年亮村”的计划，稳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两年的时间，4条2.5千米的通湾水泥路修好了，此外集中帮困资金采购了203盏太阳能路灯，让村里的夜晚亮起来。

现在，村民去乡镇、去田间地头或是饭后散步，都走在崭新的通湾水泥路上。夜幕降临，水泥路旁每隔30米就亮起了太阳能路灯，照亮村民脚下的路，也照亮了村民们对工作队的热情。

扶贫不仅仅是给钱给物，更需要的是扶志扶智。贫困户张仕平的致富经，印证了我的扶贫思路。三年前，身患眼疾的张仕平靠吃低保度日。但在我的鼓励和帮助下，他大胆创业，贷款为儿子创办了机械加工厂，还跟妻子建了小型的食用油加工厂。一开始，张仕平觉得能把油卖给村民，给村里加工点农机部件就可以了，但我隔三差五跑到他那里宣传政策，帮他更新设备、更新思路、拓宽销路，而且帮他办下了环保资格证和食品卫生许可证，同时还帮他签下了汉阳区多家餐馆的食用油采购单。他儿子的机械加工厂也开始承接一些标准件加工。每每提起这些，张仕平总是激动地说，他跟我是比亲兄弟还



2020年8月28日，张宗明（右二）到村级养鸡场查看种鸡生长情况，并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要亲的兄弟，没有驻村工作队的帮扶，自己不会成为贫困户中第一个致富的人。

张仕平的成功，让村里的贫困户对驻村工作队添了一把信任的火，也是从那时起，我在村里多了另外一些亲切的称呼：“张哥”“老张”……

用心用情，解决村民生活困难

“向前，向前，向前……”早上6时，我的手机准时播放“军歌”，开始一天的扶贫走访工作。这个习惯已经伴随我30余年。以前在部队，我要早起巡查，现在当第一书记，我依然坚持早起走村入户。

驻村第一周，我就用脚步丈量了村里的“九湾十组”，画出“扶贫态势图”。图上圈圈点点，记录着贫困户的情况和帮扶进展。两个月后，低保户王宏全一家成为“扶贫态势图”上的重点对象。

王宏全一家六口，老伴腰椎间盘突出，儿媳身患尿毒症，孙子又有肺气肿，但家中仅一人申请低保，常年靠儿子打工和务农补贴家用。2018年6月的一天清晨，王宏全家中突遭雷击，屋顶被击穿了两个大洞，房内用电线路全部烧毁，他本人胸部也遭雷电击伤。突如其来的天灾，让原本已经摇摇欲坠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躺在地上，王宏全面如死灰，充满血丝的眼睛瞪着焦黑的房顶，喃喃地说：“死了就一了百了，也解脱了，没有了痛苦……”这些话恰好被一路小跑赶来的我听见。顾不上喘口气，我就对着王宏全吼了起来：“你以为死了就解脱了？你死了，你一大家子咋办？大老爷们有什么好怕的？天塌下来，我们工作队帮你一起扛！”

在王宏全住院期间，我带着工作队员除了给他送去筹集的1万多元医疗款外，还

带人把损坏的房屋修缮加固，重新置办家具家电和生活用品。为了让王宏全能安心治疗，我把他的情况向汉阳区扶贫办作了专项汇报，提出临时性扩容驻村工作队员的申请。汉阳区扶贫办和四新生态新城管委会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及时增派力量充实了三名驻村工作队员。就这样，三个队员轮班倒照顾病人，三个队员帮忙修缮加固房屋和抢收夏粮……王宏全出院后，看到瘦了好几斤的我和他那崭新的家时，已是泣不成声。

此后，扶贫工作队每年都会给王宏全家中送去种猪崽、鸡苗，提供免费的喂养饲料，还帮助其代销，想方设法让他的家庭增加收入。2018年年底，王宏全一家成功脱贫。

其实刚驻村时，我在贫困户家没少吃“闭门羹”。每天早上6时到9时、晚上19时到21时，我都会走家串户进行晨走晚访。碰到村民不让进门时，我不争不吵，总是笑呵呵地给他们解释，看到家里有活，不管是挑水、锄草还是翻地，我二话不说上前帮忙。

转眼间我已经在群星村驻村两年有余。在这里，不仅留下了我奋斗的足迹，也让我收获了人生中另一个令我骄傲的身份——“第一书记”。两年的任期已满，但我依旧舍不得离开这里，2020年3月23日，我郑重地向上级提出了继续担任群星村第一书记的要求。因为，在致富奔小康的路上，我盼望着与乡亲们继续风雨同行！身上的军装虽然已经脱下，但无论哪里都是军人建功立业的战场；脱贫摘帽的任务虽然已经完成，但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仍在脚下！

（张宗明：武汉四新生态新城管委会驻江夏区山坡街群星村第一书记；李明：中共汉阳区委直属机关工委四级主任科员）

用脚步传递党的温暖

◇ 燕 侨

位于武汉市江夏区山坡街西南部的向阳二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50 户 119 人，村子现居住的 100 多户人口中大多数是 70 岁以上的老人。

2017 年，我接受汉阳区教育局组织安排，来到江夏区山坡街向阳二村驻点扶贫。三年来，带领向阳二村全体驻村扶贫工作人员，奋战在扶贫攻坚工作最前线，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态度诠释着奉献的真谛，用智慧和真情改变着乡村的面貌，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和爱戴。在脱贫攻坚实践中我们归纳出扶贫工作队的工作模式，受到汉阳区扶贫办高度赞扬，并专刊报道向阳二村驻村工作队扶贫作法，我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着共产党员在脱贫攻坚战中的担当与作为，奏响了新时代共产党人敬业奉献的最强音！

变静为动，勤勉务实聚人心

赴任前，汉阳区教育局党委郭均春书记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精准扶贫工作是党

中央、习总书记直接组织实施的重大民生工程，更是重要的政治任务，要求做到“倾真心，用真心，做真事”。教育局纪委书记杨建军强调说，精准扶贫“要用力、要用心、更要用心”。面对重大责任和领导的具体要求，我倍感压力。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从走上扶贫驻村岗位的第一天起，我就一头扎进村子里，走村入户了解贫困户的基本情况，没有交通工具，就换上运动鞋，用脚步丈量向阳二村的小街小巷；路况不熟，就积极询问村干部和村民，用心记下每家贫困户的位置；村民有事外出，吃了“闭门羹”也不气馁。功夫不负有心人，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摸清了所有贫困户的情况，与队员们一起认真建档立卡，为后续扶贫工作的展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实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好静不喜欢动，闲暇时分，最喜欢宅在家里读书、种花。但从 2017 年起，大家惊异地发现，我以日均 2 万步的数字，成了朋友圈微信运动里的“霸主”。

工作需要坚定的思想基础，更需要标准和方法。向阳二村驻村工作队在实践中归纳出自己的工作举措，即扶贫工作“五勤”法：手勤、腿勤、眼勤、脑勤、嘴勤；入户走访“五问”法：问健康、问收成、问政策、问需求、问家人。1000多个日夜，我们用双脚丈量过向阳二村的每一寸土地，对村里的每一个角落都了然于心。哪家的孙子这次数学成绩又进步了，哪家的鱼苗刚刚撒了种，哪家的牛又下了崽……我们都能了然于胸。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无论工作有多忙，我每天都要抽出时间完成扶贫工作日志。20多万字的札记，用最朴实的话语，记载了扶贫工作中的点点滴滴，勾勒出扶贫对象日新月异的幸福生活。它不仅见证了我们向阳二村扶贫干部们兢兢业业的驻村工作，也见证了向阳二村从贫困走向致富的小康之路。

从扶到建，精准扶贫展新貌

扶贫工作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如何根据向阳二村现状精准发力，精准施策，走出一条脱贫致富的新路子，是我们扶贫人一直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驻村工作队提出了“五化”工作方针，即工作例会常态化、主题党日活动规范化、入户走访经常化、政策宣传精细化、项目帮扶精准化。带领工作队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村干部能力建设，夯实向阳二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充分发挥村“两委”班子的战斗堡垒作用。确保各项强农惠农政策的全面落实，引领全村群众以百倍的信心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事业。驻村工作队为了全面落实国家、省、市、区各级关于精准扶贫的决策部署，

积极联系领导和帮扶单位在政策、项目、资金方面给予支持，切实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富民产业培育、职业技术培训等工作。

辛勤劳作，享受收获。我们欣喜地看到，养鸡场项目成功落地，确保了村级经济创收达到脱贫标准。按照“一户一策、因户施策”原则，针对贫困户实际，向贫困户提供猪崽、鸡苗、鸭苗、饲料和药品，跟踪进行饲养指导，帮助贫困户开垦耕地，为有务工意愿且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提供就业帮助，村民们都有了稳定的收入。这幸福的背后，是我们驻村工作队和乡亲们一起不曾停下的奋进脚步。

我是教师出身，从教38年是我独特的资源。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这一优势，推进向阳二村脱贫攻坚扶志扶智工程进一步发展，我们认真思考，寻求教育帮扶的突破口。我积极向区教育局党委建议，开展汉阳区弘桥小学与江夏区河埕小学“手拉手”共建活动，通过组织送教支教、教学研讨、师生交流互访、提供教育设备等，促使河埕小学教育质量明显提升。组织开展区教育局教育扶贫募捐活动，募集教育扶贫金25.4万余元，通过向向阳二村贫困学子提供奖学金的方式，激励他们刻苦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

舍家为民，真情付出显担当

扶贫帮困既要真心实意，更要全心全意。1000多个日夜，汉阳区教育局驻村工作队已经融入到向阳二村村民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

我一有空就为村里的老人割谷、插秧、种菜、扛米，俨然已成“老把式”。在脱贫攻坚战中，我真心实意、全心全意带领向阳

二村走在脱贫致富道路上，工作业绩得到了市、区领导的高度认可和夸奖。

然而，作为丈夫，我却有很多的愧疚。由于需要驻村，基本上很少回家，妻子开玩笑说：“现在你成了家里的稀客。”不能回家，妻子便主动去探望。结果好几次，我不是忙着给贫困户的农产品联系销路，就是看望年迈的贫困老人，妻子都扑了空。妻子不忍心责怪，只是默默地把驻村宿舍里被虫蛀了的床板拿出去晒，在蚊虫肆虐的房间多放了几瓶杀虫药。

2018年5月的一个雨夜，我走访贫困户后回到驻村宿舍，还没进门，一道闪电像一条长蛇张牙舞爪地扑来，接着又是一声震耳欲聋的雷声在耳边炸开。突然，室内传来一位驻村队员的惊叫声。一条近两米长的黑白相间的毒蛇在离床不到一米的墙角游动着，背上白环和黑环相间排列，白环较窄，背脊较高，横截面呈三角形，尾末端较尖，头为椭圆形，与颈区分较不明显，是剧毒银环蛇！

两名年轻的驻村队员吓得乱了方寸，一时不知所措。我冷静地指挥大家保护好自己，并及时打通了当地民警电话。半个小时后，暴雨中，山坡街两名干警和我一起把钻进纸盒的剧毒银环蛇带到野外放生。

这件事我一直不敢告诉家人，怕他们担惊受怕。妻子听别人讲了，也假装不知道，只是在行李袋里悄悄塞进了各种外伤膏药。

家中年迈的父亲没法亲自照料，只能托付给在外地的亲人。几年来，我觉得对家人更多的是亏欠，是内疚。按常规，教育系统派驻扶贫点的干部期满后可以返回工作岗位。由于工作强度大，生活没规律，我的胃病、偏头疼发作频繁，家人也盼望我能早点回家调养。但是，当看到一砖一瓦参与设

计施工的养鸡场项目还待完善，看到村头一锄一锄参与平整的新土正准备培种果苗，看到村民们期盼不舍的眼神，我怎么也割舍不下。向阳二村已经成了我牵肠挂肚的家园，只有村民们真正走上了富裕幸福的道路，我才能安心回到自己的小家。

几年来，我们奋战在脱贫攻坚工作最前线。投入300余万元铺设村湾公路，投入150余万元建成养鸡场，投入30余万元实施扶智工程，投入近15余万元开展贫困户小产业帮扶等等，向阳二村的人均收入由当初的不足1万元增长到2019年的2.3万元，集体收入由零增长到17万元，实现贫困村出列，全体贫困户脱贫，向阳二村旧貌换新颜。《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湖北电视台、武汉电视台多次报道我们的先进事迹。几年来，我们多次被推荐参评全国、省、市脱贫攻坚时代楷模，2019年，汉阳区教育局被评为武汉市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向阳二村驻村工作队被评为武汉市先进驻村工作队。

当下，向阳二村驻村工作队紧密团结村“两委”干部，战斗在防疫抗灾、复工复产第一线，为向阳二村的幸福明天努力奋斗。

（燕侨：汉阳区弘桥小学副书记，江夏区山坡街向阳二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初心为炬 砥砺前行

◇ 朱红西

我叫朱红西，1975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武汉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兼武汉市市政工程机械化施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我还是武汉市青年联合会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硚口区人大代表，先后获得武汉市“五四青年奖章标兵”、武汉建筑业协会“企业优秀经理”、湖北省市政行业“优秀企业经营者”、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武汉市劳动模范、湖北省2020年度“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人间万事出艰辛，越是美好的未来，越需要我们付出艰辛努力。”

从事建筑行业，至今已经有整整24年。在这24年里，我从一线施工员做起，先后担任了项目工长、项目经理、基层领导、集

团团委书记、总经办主任等职务。工作的起步注定是艰辛的，无论从事什么岗位，我都立足岗位，从一点一滴做起，将每项工作做细做深做透。我坚信“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实地”，在工地一线，面对艰苦的施工环境，我沉下心，学习图集，熟悉规范，计算工程量，大到钢筋混凝土结构，小到预埋件，不断积累实践经验。

2013年年初，时年38岁的我临危受命，担任武汉市市政集团下属机施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市政机施是一个拥有700多名职工和60多年历史的老国有企业，也曾创造过辉煌。2012年，建筑市场风云变幻，市政机施经营不善，当年亏损1000多万元，职工工资不能按时发放，专技人员纷纷另谋出路，公司在低谷中徘徊挣扎。

任董事长之前，我已在市政机施工作多年，对企业有着深厚的感情。企业的不景气，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在深入分析

和研究之后，上任伊始，我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稳定人心。在深入工地走访职工时，职工动情地谈到：市政机施是我们的家，现在这个家有难，我们要同舟共济共渡难关。看到职工信任的目光，我内心受到深深震动，我们的职工需要一个掌舵的人，需要有人去引领他们驶向梦想的地方！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将



2019年9月11日，朱红西（右二）深入光谷一路排水通道工地检查工作

每个人的力量汇聚成强大的同心圆，带领公司走出困境。我迅速组织召开干部会，分析形势，疏通思想，凝聚共识，与骨干交心谈心，将员工的心留下来、稳下来。在此基础上，我做了第二件事，那就是向市场要出路。作为施工企业，经营是企业赖以生存的根本。为了打开市场，消除以前项目施工质量不高而留下来的诸多负面影响，我使出浑身解数，积极上门拜访客户。有的客户不见我，我也不气馁，一次不见就去第二次、第三次，终以自己的诚心和恒心打动了客户。一个月下来，仅汽车油费，我就用掉了8000多元。在我的多方努力下，企业终于走出了经营僵化的困境，成功承接雄楚大街改造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龙王嘴污水处理厂、岳家嘴地下空间等重大民生项目。

2014年，公司一举扭亏为盈，当年产值突破10亿元，创利900多万元。在随后的几年里，我团结带领干部职工乘势而上，以推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为目标，坚持“稳

中有为，提质增效”的总基调，在激烈的市场搏击中实现华丽转身，创下了产值翻倍快速崛起的神话。现在，公司已经拥有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一级资质，年经营额和产值已经达到双30亿元，是2013年的6倍，企业步入高质量快速发展的轨道，优质高效地建设了以东沙连通、阅马场地下通道、江城大道、地铁2号线广埠屯站、雄楚大街高架、武汉市首条BRT、江北快速路、南湖联通渠、光谷南延线等为代表的“地标”工程、民生工程，为武汉城市发展贡献了企业的力量。

每当看到川流不息的车辆行驶在市政机施建设的一条条道路上，我的内心不禁迭荡起伏，多少个日日夜夜，我和我的团队以钢筋和混凝土为伴，在“白加黑、五加二”模式下奋斗拼搏，用智慧和汗水将手中的施工设计蓝图一砖一瓦地变为现实，建起武汉城建样板工程，树起市政机施建筑史上的一座座里程碑。我想，对于一名城市建设者而言，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栉风沐雨 砥砺前行

“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担当、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创新的队伍，是企业长足发展的基石。”

在残酷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如何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我大胆拓展经营思路，探索“设计施工”一体化的合作新思路，实现全方位发展的战略部署。近几年，我带领经营团队抢抓四水共治、军运会及国家大力推进 EPC、PPP 模式的城建新重点，主动发挥能动性，积极参与市场竞争。2019 年共计中标水环境治理项目 6 个，参与了 6 个军运会项目建设，中标 EPC 项目 7 个。我提出，坚持传统业务、专业化发展并重，实现区级市场经营新提升。2019 年，公司不断巩固洪山区、东湖高新区、硚口区、沌口经济开发区等重点区域市场。洪山区的经营项目数量逐年跨越，呈现几何式增长，打造出“洪山模式”，在洪山区，我们的口碑甚至超过了部分央企。在硚口区，市政机施利用硚口区本土企业优势，先后中标硚房集团的立面整治 5 个项目和硚口区城管委的园博大道、航空路、民意四路等 7 个项目，牢牢地站稳了经营市场，将“洪山模式”在硚口区成功复制。

目前，公司在建项目 40 余个，而每一个项目的成功承揽背后无一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决策，无一不是我和经营团队辛勤耕耘、呕心沥血的付出。

我清楚地记得，当一个准备了一个多月的大项目开始投标时，我和团队两天三夜没有合眼，办公室的灯光夜夜亮到天明，大家聚在办公室里精心设计投标方案。投标的最后一天，我们热烈讨论各种技术参数，从

白天一直到第二天的上午 10 点多钟，最终拿出了最优方案。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顺利地拿下了那个项目。中标的一刹那，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强压下去的疲惫和困乏如潮水般涌来。

对每一个重点项目，我都率先垂范、身先士卒，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除了开会，绝大部分时间我不是在东奔西走跑市场，就是在工地与员工们在一起。

记得上任不久，2013 年 8 月，公司承接了龙王嘴污水处理厂项目。该项目上过电视问政节目，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原本两年的正常施工，周期缩短为一年，时间紧、任务重，我带着施工团队吃住在工地，抓进度、保质量、促安全生产。当时正值武汉市最炎热的季节，我和同事们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每天晚上过水洗洗，第二天接着穿。克服重重困难后，公司最终优质地交付了产品，获得业主的高度认可，连连称赞市政机施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铁军”。就在那一刹那，所有的疲惫都化作一股奋勇前行的力量。

在创造了“龙王嘴速度”后，我带领干部职工又相继创造多个机施效率、机施速度。2016 年在四水共治建设中，市政机施承接的南湖连通渠节点排水改造提前半个月实现通水目标，缔造了新的“南湖速度”。2019 年，时逢武汉市承办军运会，凭着良好的市场信誉，公司承建了光谷南延高架、滨河街道排、硚口区立面整治、珞瑜东路道排等 6 个军运会重点项目。面对工作量大、时间紧、标准高的整治任务，公司选派最优秀的管理团队，按照细致、精致、极致、卓越的目标，全员放弃春节假期，战雨天，抢晴天，严格落实节点工期，又刷新了高架桥建设“南延速度”，安全平稳、不折不扣、

快速高效地完成了建设任务，实现了对武汉市的承诺。

“人民的安全、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我始终牢记安全第一，对质量精益求精，不断攀登科技创新的高峰。2013年，在公司承接的雄楚大街改造工程中，我组建精英团队开展“大型城市快速高架桥施工成套技术研究”“城市桥梁立柱饰面清水砼关键技术研究”等，探索混凝土配合比，刷新了武汉市清水桥墩的新工艺。多年来，公司竣工项目质量合格率均为100%，4项工程获国家级金奖。

逆行向险 同心战疫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我们是与病毒赛跑，必须不惜代价，拼尽全力，没有任何退路可言。”

2020年1月24日凌晨1点，正是大年三十，本是万家团圆的时刻，我接到火神山医院建设的紧急任务，第一时间集结随时待命的8支应急党员突击队火速赶起火神山建设一线。在连夜搭建的临时指挥部帐篷里，我召开紧急动员会。“召之即来，战之必胜，机施公司定当不辱使命！”我深知，这是一场非同一般的大战，绝不能有丝毫闪失。我亲自上阵蹲守一线，以“分钟”计划挂图作战，与74名干部职工、1360余名作业人员一同坚守在施工现场，统筹部署人员入驻、物资协调、施工计划、工序穿插等工作。在满

是泥泞的施工现场，我和同事们全然忘记了身体疲劳，实在熬不住了就在车里打个盹，饿了就在棚子里吃两口盒饭。

连续七天七夜的热血鏖战，市政机施人终于完成了5万平方米的场地平整及2.3公里的配套管道建设，为后续单位提供了作业面。此时，我紧绷的神经才稍微放松一点点，连续高强度、超负荷的运转，疲惫不堪的我眼里全是血丝。

电话响个不停，指令不断下达。1月31日晚10点，我还在火神山建设现场，又接到硚口区防疫指挥部的紧急电话，我即刻部署人员赶赴指定的同普、广发医院，5个小时就完成隔离区建设任务。当时正值春节，又赶上武汉封城战疫，作业人员、材料、设备等施工资源调度极其困难，市政机施如此快速的行动，令指挥部赞叹不已。

疫情来势汹汹，一项项紧急任务接踵而至，市政机施相继接到洪山、东湖高新、江夏、江汉等各大片区抢建任务，我率领团



2020年1月28日，朱红西（左一）在火神山医院工地现场指挥

队连续作战。在对一线的党员干部作动员时，我说：“关键时刻党和国家把任务交到我们手上，这是我们至高无上的荣誉，我们要全力以赴，第一时间高质量完成任务。”战场遍布武汉三镇，如何排兵布阵，也考验着团队的作战能力。5小时内完成24小时的作业任务，原计划两天交付的方舱必须一天之内交付，夜间紧急施工确保第二天一早患者入住……我带领着团队每天上演着这样的“加速度”。

持续多日的日夜作战，一线的同志们全部超负荷运转。每每看到同志们疲惫不堪的身影，我心疼不已，从全面部署到后勤保障、防疫消毒，每件事儿不论大小，我都亲力亲为。“早一分钟抢建好医院，早一分钟收治病人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整整40天，我带领团队冲锋陷阵，以最坚决的态度、最迅速的行动、最有力的措施，承担了硚口、洪山、东湖高新、江夏、江汉等片区方舱医院、隔离区等共计38项抢建任务，包括7家方舱医院、11个隔离点、2处医护人员休息点，平均一天就建成一座“生命方舟”，累计搭建完成救治床位1.6万余张。

在这场牵动人心的战疫中，我觉得自己不仅仅是部署作战的指挥官，更是冲锋一线的战士。从踏上这个特殊的战场开始，我就和同事们一心扑在了抗疫一线，没有回过一次家。我常年奔波于一线，妻子早已经习惯了我的忙碌，也非常明白在这样的时刻我一定是站在最前沿的指挥官。“家里有我，你放心。”一句简单温暖的话道出了妻子的理解和支持。亲人的牵挂我记在心里，只能在电话里问候年迈的父亲，报一声“平安”；而每次电话那头传来7岁儿子稚嫩的声音“爸爸，你什么时候可以回来”时，我都心

怀愧疚，忍不住潸然泪下。我对儿子说：“等疫情结束后，爸爸一定好好陪陪你和妈妈！”

4月8日武汉解封，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加快复工复产，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成为另一场和时间的赛跑。我聚焦公司年度经济责任目标任务，根据“目标不变、任务不减”的原则，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的总体思路，合理安排有序复工。

目前，建设的广水市“新地标”——广水四馆三中心于2020年4月8日进入了主体施工阶段；武汉市垃圾分类重点项目——古田垃圾转运站于2020年5月15日实现了主体完工；武汉市四水共治重点项目——湖溪河综合整治工程在2020年5月28日完成了初雨厂主体结构封顶，预计10月份完工；光谷南延的剩余道路部分及高新六路互通立交将于2020年12月底前完工。

初心不变，使命在肩。企业的使命、肩头的重担、职工的期盼一直是激励我前行的力量。“十三五”末期，市政机施将努力成为达到双50亿规模的大型一流企业。这是我的梦想，而在梦想开花的大道上，我将带着市政机施人奋力前行。

盛世育桃李，佳文泽后学

——忆刘盛佳教授

◇ 龚胜生

学术研究之余，我爱写点流水账式或打油诗类的文字。上大学时，我曾做过作家梦，并为之付出过努力，养成了一种涂鸦文字爱好。2020年6月，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校史馆馆长傅强要我为“华师学人”系列写一篇纪念刘盛佳教授的文章，拖了两个多月，始终没有动笔，倒不是不愿意去写刘盛佳教授，只是这类性质的文章，容易引发悲伤的回忆，心情难以平复。年过半百，送别的人自然已经不少，但只有2001年导师史念海教授逝世和2010年同事刘盛佳教授逝世写了即时的悼念文章。史念海教授是我跟随六年的导师，他去世时我正在加拿大女王大学，不能回来送别，所以写了点文字悼念他。刘盛佳教授是我亦师亦友的同事，因为感伤于他的人生际遇，我在科学网发了点文字悼念他，始料未及的是，这篇博文引

发媒体跟进，把刘盛佳教授许多生前平凡感人而又默默无闻的事迹发掘了出来。现在，刘先生已经离开整整10个年头，可于我而言，他的音容笑貌恍如眼前，他的人物形象更加高大。

古往今来，囊中括外，大凡受到人们景仰的贤者，其生命的归宿，往往都是“寂寞成名身后事”。在我看来，刘盛佳教授就是这样一位贤者，他的高贵人格，他的坚强意志，他的赤子情怀，他的学术贡献，只有待他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人们才会觉得他的可贵、可尊和可敬。刘先生是“感动中国”的候选人物，官方和民间都给了他很高的评价。

刘盛佳教授1938年生于湖北黄冈县（今属团风县），比我年长27岁，我们是整整20年的忘年之交。我初识刘先生是1990年

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国际历史地理学学术会议上。当时，根据他的谈吐，他与学界大佬们的熟悉程度，我以为他应该早就是教授了，我问他是否带了历史地理学的博士生，他回答说没有。两年后，我到他在的华中师范大学来工作后才知道，当时他还只是副教授。俗话有云：“同船过渡，五百年所修。”我与刘先生相识与共事，应该也是前世修来的缘分。我俩虽然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但我们有着相似的童年、相似的志趣，因而也有着相似的人生际遇、相似的教师情怀。刘先生少年时读的是苦书，他在《回忆我在黄冈中学的六年生活》中谈到，他之所以能读上中学，与一位名叫杨祖华的老师的无私帮助分不开。事情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先生还记得这么清楚，说明在他心中，师恩是永远也不可忘记的。我能不辍学，甚至走上历史地理学的专业道路，以及后来和刘先生相识，其中也有这样一位没齿难忘的老

师。1980年我上高一时，因为读不起寄宿，只得每天打着“飞毛腿”到十五六里外的区办高中（涟源五中）来回走读，当时的班主任邱述先生就让我和他大儿子睡一张床，让女儿与住读的女学生去睡，自己和小儿子挤一张床。就这样我在他家住了整整一个学期。邱老师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1977年恢复工作不久又丧偶，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小孩。1981年高考我以一分之差落选，整个应届生班没有一个人考上。邱老师鼓励我复读，并建议我转到另一所升学率较高的涟源四中去学习。1982年高考“预考”，我考出了全校第三的好成绩，邱老师听闻后十分高兴，可就在即将正式高考的前夕，我的父亲在煤矿事故中突然去世，邱老师不知从哪里得知消息，写信给我，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话语激励我。我考上大学后，得知我学的是理科的地理却做着文科的作家梦，他又让我读《水经注》和《徐霞客游



2000年5月，华中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学专业硕士生答辩，前排右四为刘盛佳教授，右三为龚胜生教授

记》。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位老师的指点，才使得我考研时选择了历史地理学。在每个人的一生中，可能都会遇到一个改变你生命轨迹的“贵人”，我和刘盛佳先生一样，人生中的贵人都是普普通通的老师。在我们湖南老家，家家户户堂屋的神龛位都会写着“天地国亲师位”几个大字，亦即天地、国家、父母、老师是最值得敬重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我的潜意识里，老师的称谓是神圣的，老师的地位是崇高的。我相信，在刘盛佳教授心里，一定住着一个神圣而崇高的“师魂”，惟其如此，他才如此铭记老师恩德，如此关心学生成长，如此忠诚和热爱党的教育事业，从而成为“感动中国”的优秀教师。

人生也是一个生态系统，不是冥冥之中的安排，便是环环相扣的肯綮。1990年在复旦大学的学术会议交流中，刘盛佳教授得知我是湖南人，是史念海先生的博士生，说他也准备在华中师范大学成立历史地理研究所，问我毕业后愿不愿意到这里来工作。当时我未置可否，但从此我们保持了联系。1991年，我因撰写《清代两湖农业地理》的博士学位论文，到湖北省图书馆来查资料，特意拜访了刘盛佳先生。那个时候，他住在学校东区的一栋两室半的房子里。他见到我十分高兴，谈了很多他的历史地理的研究计划，中途又把他的两个研究生姜爱明、王义民叫过来认识了，嘱咐男生姜爱明带我到桂子山各处去转转，下午还带我去见了当时地理系主管科研工作的系副主任邵清於教授。邵清於教授是从事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从交谈中感觉他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并不怎么看好，因此，说老实话，这次华中师范大学之行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待我暑期结束从湘西、鄂西考察山地农业回

到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的时候，我写信给刘盛佳先生，感谢他对我工作的关心，特别感谢他向我介绍的鄂西山地的垂直农业情况。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再次诚恳邀请我到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来工作，并说这件事情已经得到系主任邓先瑞教授的支持，过段时间邓主任要来陕西师范大学开会，到时会与我见面。与此同时，他还写信给他中山大学的学弟、史念海先生的助手朱士光教授，要他给我“敲敲边鼓”。朱士光教授是武汉人，20世纪60年代中山大学本科毕业后到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院士）门下攻读历史地理研究生，因为家庭历史的问题，中途被“发配”到西北水土保持所工作，直到80年代史念海教授把他调到唐史研究所（后更名历史地理研究所）工作。史念海教授是山西平陆人，有时听不懂我这个湘中佬的“普通话”，这个时候，朱士光先生就会把我的话翻译给史先生听。刘盛佳教授知道我和朱士光先生的关系，让朱先生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肯定是有效果的。这年秋季开学后不久，邓先瑞教授赶到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开会之机，带着华中师范大学人事处的工作商调函与我见了面。在交谈中得知，邓先瑞教授是湖南耒阳人，跟我也算是“老乡”。我是一个家乡观念比较重的人，因为这层地缘的关系，无形中又增加了我到华中师范大学来工作的分量。记得当时我选择工作的时候，只愿意去三个城市：南京、武汉和长沙。因为刘盛佳先生的缘故，突然发现长沙离家太近，可能经常有人来打扰，不好；南京离家太远，回一趟家不容易，也不好；武汉离家不近也不远，正好。现在看来，人在做选择或者抉择的时候，往往会受到当时心境的影响。于是，我便在邓先瑞教授带去的工作协议上签了字。1992年6月，我博士毕业了，7月份就来到华中

师范大学报了到。据说，当时全国只有不到 6000 人获得博士学位，我和数统学院的张正杰是“统分”来的第一批应届博士，我也因此享受了地理系第一位博士的荣光。从此，我便与刘盛佳教授成为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共同见证了华中师范大学的地理科学从“地理系”到“旅游学院”，从“旅游学院”到“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的嬗变，在桂子山上共同度过了近二十年的苦乐时光。

在历史的长河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创造历史。刘盛佳教授是一个创造历史的人，他的学术人生，一步一个脚印，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1992 年，我到地理系工作，刘先生评上地理学教授，高考取消地理科目，于我、于刘先生、于地理系都是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高考取消地理，地理系的发展举步维艰，停薪留职者有之，下海经商者有之，调离单位者亦有之，到 1996 年，地理系不得不更名为“旅游学院”，此后直到 2002 年，“旅游学院”再更名为“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地理学发展再次回到正轨。这中间的十年，毫无疑问是桂子山地理科学发展的“空档期”。正是在这个时期，刘盛佳先生迸发出巨大的工作激情，心无旁骛、争分夺秒地开展学术研究工作。我作为他的助手，先是参加他主持的《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生产力布局研究》项目的研究，参与他主编的《中国地理》教材的编撰，后又负责他主持的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湖北省以武汉为龙头，加快“三江”“两线”开发的总体战略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长江流域经济发展与上中下游比较研究》申报书的撰写，这两个项目都获得了基金资助。这些工作的参与，说实在话，当初心里还是不太乐意的，因为我主攻的是历史地理学，我是冲着要成立“历史地理研究所”才到这里

来工作的。不过现在回顾起来，正是这些现代地理研究的实践完善了我的知识结构，使我在经济地理和区域地理方面也能谈出个子丑寅卯。尽管如此，我的历史地理学情结是割不断的，这点刘先生是看在眼里装在心里的。1994 年，我评上了副教授，刘先生认为我应该可以给研究生上课了，于是带我去找人文地理研究生指导组组长田松庆教授，询问是否可以在人文地理研究生中开设历史地理学课程。虽然没有成功，但刘先生还是为我争取到为他自己的“行政区划与地名学”方向的研究生开设历史地理课程的权利。1995 年，刘先生争取到历史系（现历史文化学院）熊德基教授的支持，聘为历史文献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成为地理系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当时设置的博士生导师方向为“历史地理文献”，指导组除刘先生外，还有王会昌教授和我。不过，刘先生好像只招收了三四届博士生就没有再招了，个中原因很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刘先生又开始了新的学术领域的探索。

评价一个学者，“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著作等身，硕果累累”，这固然是一种美谈，一种美誉；但是，“学术敏锐，能够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更是一种本领，一种极致。要我来评价，刘盛佳教授显然属于后者。不妨举几个例子。1992 年，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五点主张，宣布中国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1994 年，《中国 21 世纪议程》颁布，可持续发展迅速成为政界、学界和新闻舆论界的热点。刘先生即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捕捉到这一研究热点，于 1995 年发表了《持续发展与地理学之管见》，于 1996 年发表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原

则》。1996年8月10日，“华中师范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成立，这是中国高校第一个可持续发展研究机构，刘先生任中心主任，我任常务副主任。这年9月，我取得硕士生导师资格，刘先生便让我培养“可持续发展”方向的硕士生。此后几年，刘先生主持了多个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项目，如与湖北省委党校李春明教授（后任荆州市委副书记，湖北省政府秘书长、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合作开展湖北省可持续发展研究，与湖北省科技厅社会发展处合作开展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00年来湖北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空间变迁研究》。2000年6月，我去加拿大女王大学地理系访问，刘先生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投资环境学。当时，招商引资成为经济建设的重要抓手，投资环境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学术热点。这个机遇刘先生又把它抓住了，2002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投资环境研究中心”成立，刘先生任中心主任，他的学生邓宏兵任常务副主任，从此，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事务就全部交给了我。2003年，刘先生从教学科研工作第一线退了下来，作为省政府参事，主要是为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出谋划策，短短七年时间，他竟然撰写了32份高质量的建议，所有建议都得到了省政府的采纳。作为省政府参事，是没有硬性的任务要求的，刘先生取得如此优异的参政议政成绩，一方面因为他是“湖北通”，对湖北的情况很熟悉，更重要的是，他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能够与时俱进。写到这里，我又不由得想起2008年他与我商议“汉商文化”研

究的事。他说，武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武汉的城市文化必须好好发掘。有人说武汉的城市文化是知音文化，有人说武汉的城市文化是江河文化，刘先生则认为，武汉的城市文化应该是商业文化。他问我：“汉商文化这个提法怎么样？”我表示认同，并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武汉作为江汉之会，九省通衢，五方萃处，汉口镇在明清之际就已经成为“四大名镇”之一，不仅川贵、两湖、汉中许多商品在这里集散，甚至九江的稻米有时还要装运到汉口贩卖，其商业地位在长江中游无可匹敌，这从清道光初年范锴所著《汉口丛谈》就可略见一斑；至于民国时期，城市以“大”称者，除了上海就是武汉，武



2001年参观刘少奇故居花明楼时，龚胜生教授与刘盛佳教授（右）合影

汉不仅在民国时期做过直辖市，新中国初期也做过直辖市。如此云云。听了我说的话，刘先生很高兴，马上表示要我来牵头做这个事。我因手头待完成的工作太多，表示了委婉的拒绝，同时向他推荐了两位年轻学者。刘先生不置可否，但看得出来有些失望。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颇有一些对不住他。总之，在我看来，刘盛佳教授是一位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地理大家，从行政区划与地名学到可持续发展，从可持续发展到投资环境的开拓，无不体现出他敏锐的学术洞察力。

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72个春秋的人生旅程中，刘盛佳教授经历过不少坎坷，遭受过不少痛苦，但他一贯乐观开朗，身体的残疾没能阻挡他对事业的追求，生活的不公也不能磨蚀他对生活的热爱。更宝贵的是，他有一个热爱生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强大的精神世界的支持，也许他在不惑之年身体致残时就已经倒下。1965年冬，刘先生在神农架进行农业地理界线考察时，突遭暴风雪袭击，因冻伤引发脉管炎，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1979年冬至截肢残疾。从此，他便与轮椅相依，与拐杖作伴，在轮椅上度岁月，拄拐杖走年轮。2006年，刘先生心脏病发作，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后，我和爱人去医院看他，他还是那么乐观，那么健谈。他在叮嘱我注意身体、不要熬夜时，还开玩笑说，现在是“糖友”了，要向我请教怎样使用胰岛素笔进行注射，因为他还查出了糖尿病。我因长期熬夜写作，在1997年破格晋升教授的次年就查出了糖尿病，到2006年时已经注射胰岛素五六年了。有的人得重病后，变得消极颓废，精神世界很快就会崩溃，但刘先生没有，甚至反而更加坚

强。这里，我只说刘先生在生活中的两个细节。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刘先生安装的是老式笨重的假肢，无论天气多么炎热，他总是穿着长裤、套着雨靴，不明就里的人觉得有些怪诞，在外地开会时我陪着他走路，几乎每次都有人悄悄问我是怎么回事，当我告知实情后，他们无不对他肃然起敬。有时候走的路长了，截肢部位因为摩擦过多，就会破皮渗血，刘先生也不避讳，回到房间，就在我面前卸掉假肢给伤口擦碘酒。还有，地理系原来在桂中路的二号教学楼，刘先生住东区家属区，到二号教学楼去必须要经过七号楼前的陡坡，这个陡坡在学生们中间有个绰号，叫做“绝望坡”。刘先生摇着轮椅到这里的时候，上坡时必须下来使劲推轮椅，下坡时又必须使劲拽轮椅，好几次即使我帮他扶着轮椅，上下轮椅时他都要连打几个踉跄。从1979年截肢到2010年仙逝，刘先生在轮椅上度过了整整31个春秋，这得付出多少艰辛！如果没有对生活的热爱，没有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他又怎能活得如此乐观，如此精彩？！

不知是谁说过，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是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岁月如梭，屈指算来，我与刘盛佳教授从上海相识到桂子山送别，整整20个年头。回忆这20年的岁月，就不能不提到师母——刘先生的夫人陈代娣老师。如果说刘老师是一个成功的男人，那么，师母就是站在他背后的伟大的女人。可以这样说，师母不仅是刘老师的腿，甚至也是他的眼睛。师母本来是卓刀泉小学的老师，我到桂子山工作后的第二年，也许是第三年，她就退休了，从此全身心地照顾刘老师的生活起居，辅助他的教学科研。每次刘先生要上本科生的课时，因为没有研究生去帮忙推轮椅，师母总是推着轮椅送他

爬上七号楼前的“绝望坡”后才折回家去。刘盛佳先生喜欢看报纸，每年都要订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好几种报纸。刘先生浏览报纸时有一个习惯，就是读到有用的材料就会在旁边写上报纸的名称、日期、版面，然后师母就把这些材料剪下来，再工工整整地粘贴成册，供刘先生写文章时查阅使用。刘先生之所以能够紧跟时代步伐，在参政议政中写出高质量的建议，和师母默默无闻的辛勤劳动显然是分不开的。2001年1月28日，刘先生写就了一份2万余字的《风雨历程》的手稿，其中有这样一段感人至深的话语：“风雨历程四十年，陪伴我的是夫人陈代娣。当1959年我还是一个穷学生时，她风姿绰约，有很多追求者，却选择了我。1960年我们结了婚，此后由于我的命运多舛，相当长时间我的工资仅够自己花销，她用自己的工资维持一家生计。最大的痛苦便是我日夜无法入睡使她肝肠欲断，割肺截肢时使她流的眼泪无法计量。她默默地忍受着，使我有一个温馨、安逸、慰藉的安宁的港湾。她可能是上天赐给我的一片光彩的云霞。这是不幸人生的最大幸运，让好人一生平安，相伴到永远。”字字含爱，句句有情，这是刘先生发自肺腑的表白，读来令人动容。都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看到师母这样支持刘先生的事业，加之师母的鼓励，我爱人也帮我做过近两年的剪报工作，只是后来因为工作太忙，加之电脑和网络的普及，没有能够坚持下来。有道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在人生的际遇上，我和刘先生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婚姻家庭中，我们也能照见他们的影子。

《周易》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是美的，研究大地运行法则与

规律的地理学也是美的。刘盛佳教授热爱这种美，奉献这种美，也创造这种美。他是一个用轮椅碾度岁月的强者，是一个用拐杖丈量大地的智者，是一个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的地理学者！2010年10月3日，刘盛佳教授心脏病发作，与世长辞。他是突然离开的，也是带着遗憾走的。因为，他的《汉商十讲》还只写到第五讲；因为，他的《地理学之美》的编纂大纲也只写到第四章；因为，他还有许多研究计划没有完成，还有许多的地理学之美要去发掘。1998年是刘先生的花甲之年，他写了《一个残疾地理学者的学术生活》，文尾写道：“但愿以后的岁月，能够为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再添砖加瓦。”2008年是刘先生的古稀之年，他写了《我的三十年》，文尾又写道：“不奢望再干三十年，如果给我十年，将我几十年的积累与研究留下来，这便是我的夙愿！”惜哉！天不遂人愿，夙愿成了遗愿！不知不觉，又是十年过去，回想起与刘先生的点点滴滴，恍如昨日。最后，谨以此联纪念我亦师亦友的刘盛佳教授：“盛世育桃李感动中国树教师风范，佳文泽后学名闻天下为地理大家。”

（龚胜生：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

忆中南民族学院干部轮训部

◇ 李大杰

1950年，民族干部培训班附设在中原大学里，由孟夫唐同志负责办了一期。1951年，中央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由时任湖北省副省长孟夫唐担任分院院长。1953年，分院改名中南民族学院，由当时中南行政区统战部副部长熊寿祺同志担任院长。1954年，改由李守宪同志担任院长，徐少岩、张文藻任副院长。从1951年到1954年这段时间，学院是以干部轮训部政治短训班和预科部的预科班为主，1954年以后，陆续举办了政法班、高山族班、教育行政班、会计班、农经班等。干训部共培训了3000多名不同专业的少数民族干部，其中有海南黎王王国兴、湖南瑶王李昌夫、广西壮族人民代表黄莲威等地、县、区干部，对当时广西、湖南、广东、海南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55年，我从研究班毕业后，被分配到干部轮训部哲学教研组担任教学工作。

1958年，陈玉鸣同志从中央统战部调来我院工作，担任干训部党总支书记，调我任党总支秘书，一直到1970年民院撤销。

陈玉鸣同志在延安进过抗大，对干部轮训有经验，在她主持干训部后，干训部的工作有很大起色。她常说，民院干训部一定要注意调查研究，因为培训干部要根据对象需要来确定培养形式和内容，也就是说，民院干部培训是根据民族地区干部需要去决定培训对象和培养内容的。这正是民院从1951年创办干训部以来对少数民族干部培训工作的办学宗旨的总结和经验的写照。

陈玉鸣书记很重视调查研究，1958年曾两次到广西、湖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我也有幸参加。通过调查，了解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特别是民族干部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回院后，陈书记正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还没想好，1960年中央统战部来调令，要叶尚志院长助理和陈玉鸣

同志到上海市委统战部工作。所以，这个问题一直到“文革”期间中南民院撤销，干训部都没解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干训部政治班和其他班都停止招生。1968年，湖北省军区进驻民族学院校区。1970年，中南民院撤销合并到华中师范学院，白瑞西院长到华中师范学院当院长兼党委书记，我和大部分老师、干部也到华中师院工作。1980年，中央决定恢复中南民族学院，因旧校址已被湖北省军区占驻，所以新校址由湖北省提供，经勘查决定在现校址复办。当年即由白瑞西为首的筹备组着手校舍建设工作，在湖北省、武汉市的大力支持下，几栋教室和学生宿舍陆续建成。中南民院复办后，我也回到了民院，并被任命为干训部党总支书记。1981年11月2日，中南民族学院干部轮训部第一期干训班正式开学了。

为办好中南民族学院，院党委决定到兄弟院校参观学习。1980年4~5月，由白院长、贾副院长领队，率各部系领导共七人出发了，我也有幸参加。第一站是西北民族学院，我和西北民院干训部负责人交换意见时提出，在中南少数民族地区，地、县、区干部文化水平普遍都很低，有的是文盲、半文盲，学习、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困难很大。我们一直想解决这个问题，曾设想不招政治短训班，改招政治专科班（两年制）等，他们很同意我们的意见。到西南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他们也有同志同意我们的意见，特别是云南民院谈的最多，由于语言不同、风俗习惯不同、文化水平又低，工作上的困难更突出，不解决这个问题今后工作更困难等等。通过这次联系和交换意见，西北、西南民院和云南民院干训部都认为要改变招生培养对象，要依据现实情况招收少

数民族在职干部两年制政治专科班。为此，大家各自向国家民委教育司写报告，到教育部备案。1983年，我院干训部政治班从少招生到停止招生，改招中南、华东、西南在职少数民族干部两年制专科班，共200多名，其中有海南黎王王国兴的儿子王纲、湖南瑶王李昌夫的儿子李明初、高山族高德旺的子女高美琴和1984级的高文海。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培养了近千名少数民族干部，毕业后回原地区工作，给这些地区增添了不少骨干力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特别重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工作，投入大量资金，有的采取免费上学、半免费上学的方式，促使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多年来，少数民族地区各方面的大发展，干部队伍的常规更换和退休制度的执行，使少数民族地区干部队伍面貌一新，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前几年，已开始出现大学毕业生当村官的喜讯。如此好的形势下，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干部的大专班已经失去作用，为少数民族地区培训干部的干部轮训部也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所以，当时学校决定撤销干部轮训部是与时俱进，是正确的。

多年来，有20多位干训部大专班毕业生给我来信来函，一方面是感谢民院对他们的培养教育，另一方面是询问干训部被撤销的情况，有的还说打算继续送子女到这里来读书，等等。因我已退休多年，对撤销干训部的情况不了解，故不能及时给他们回信，在此我就以回忆民院干训部的历史来作为给他们的回复吧。

（李大杰：原中南民族学院干部轮训部党总支书记。本文写于2016年）

一名政协委员的体育人生

◇ 孔 军

我是孔军，来自体育界别的一名市政协委员，任职于武汉大学体育部。回想过往，自己从一县城稚嫩少年，来到武汉求学，到毕业后留汉工作生活，一晃已是几十年。期间，无论是个人的学习、生活与成长历程，还是职业发展路径与轨迹，乃至参政议政与委员履职经历，无不与“体育”二字相伴相连。

家乡体育缘

20世纪70年代初，我出生于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一个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山区小城。80年代的通城，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经济欠发达，文化体育设施和活动相对匮乏。很幸运，12岁时，我正式接触到体育，开始规范的运动训练，并爱上了它。初一时，启蒙恩师薛汉华教练和排球运动走进

了我的生活，薛教练是武汉体育学院1976级的排球专项学生，毕业后分配至通城县体委业余体校担任教练，当时的薛教练血气方刚，业务能力强，事业心和敬业精神更盛，一心要带出一支高水平的青少年排球队伍。当时，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让国人如痴如醉，中国女排精神更是激励得国人热血沸腾。我和队友们在教练的带领下起早摸黑、刻苦训练、打磨技术、钻研战术，反复磨合和密切配合，多次获得咸宁地区青少年排球比赛冠军，引起了县政府部门的重视。初中毕业后，县重点高中（通城一中）首开先河，破格将排球队应届队员以特长生的身份招致麾下，进入高中阶段的学习。高二那年，鉴于在咸宁地区多次比赛中的出色表现，我作为唯一的县级队员被抽调到地区排球队参加湖北省青少年排球比赛，荣获第

三名的优异成绩，我也有幸获得二级运动员资格，这在当时的通城县体育界非常难得。80年代的小城弥漫着一种观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般家庭都反对孩子参加运动训练。我怕家里反对，晚自习回家前，总是将体校发的衣服和鞋子藏在家外的某个地方，早晨出门后换上继续参加训练。后来，训练的事情还是被妈妈发现了，她提着运动鞋来找薛教练，告诫他，我的学习很不错，请他不要误人子弟。也不知道薛教练怎么做通的工作，竟然说服了妈妈让我留队继续训练。

80年代的通城，唯一风靡全县的运动是篮球，县里每年都有职工篮球联赛，群众基础好，参与人数多，气氛热烈。我从高一开始自学并苦练篮球技艺，平时观察篮球打得好的叔叔们的技术动作，模仿有限的教学资料，每天至少花费3小时以上的时间进行训练，凭借不错的身体素质和协调能力，训练进展很快。高二下学期，我作为全县两名学生队员之一代表县教育局破格参加了县职工篮球比赛，凭借速度和灵活性获得极大关注。由于稚嫩、不成熟和经验不足，我和另外一名学生队员均在比赛中骨折受伤，付出代价。之后，我俩打着石膏返回球场继续看球和呐喊助威，全场球迷们为我们的执着和热情起立鼓掌，让我深受感动。高考刚刚结束，县人民银行看中我的体育特长，向我伸出橄榄枝，邀请

我到县人行办公室实习，承诺工作两年后送我到湖北省银行学校深造。县人民银行在小城是很好的工作单位，家人感觉很自豪，我也受到极大的激励，在办公室通讯员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了近三个月的时间，非常感谢和感恩县人行给了我第一次接触社会的机会和工作经历。

波折求学路

1988年8月，我收到了来自武汉体育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以文化486分、体育85分的优异成绩被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系本科录取。经过斟酌和思考，我满怀希望和理想，背着行囊，来到大武汉。经过四年的本科教育和专业熏陶，我的运动专项能力和体育综合素养得到明显提升。1992年7月大学毕业后，经过多次理论考试和技术考核，我被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体育课部招致麾下任教，开启了体育教师生涯。



2017年，孔军委员（右二）参加武汉市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留影

青年体育教师的生活简单而充实，也伴随些许迷茫。每天在运动场上释放充沛的精力，挥霍无尽的青春之余，总觉得该做些什么，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做。1997年8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获悉湖北大学体育学院正在招收第一届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生班学员，顿时眼前一亮，决定继续求学深造。经过三年的努力，2000年10月，我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成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体育课部第一位获得硕士学位的教师。这次学习经历给我带来极大的信心和鼓励，我决定继续深造。由于自身的封闭和信息的不对称，我的考博之路一波三折，2001年开始，我踏上了迷茫甚至荒谬的考博之旅——试错之旅，三年中我报考了三个完全不同方向的博士专业，从高等教育管理跨越到运动训练学再跨越到信息资源管理，报考学校从华中科技大学转到上海体育学院再转到武汉大学。三年中，我废寝忘食，每天除了工作和睡觉，其余时间全部用来思考和复习，复习书籍从教育学、高等教育管理到运动训练学、社会学再到情报学和信息资源管理。2004年9月，努力终得回报，我被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师从信息管理名家胡昌平教授。博士在读期间，得益于导师的谆谆教导、高水平学科平台和研究团队的熏陶，我逐渐找到研究方向——体育信息化。四载春秋，完成博士论文《竞技体育信息集成服务》。2008年12月，我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成为武汉大学体育部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

体育教育梦

2010年5月，武汉大学二级单位实行换届，学校不拘一格降人才，鼓励想干事的

年轻人走上前台。我鼓足勇气，走上了自荐的讲台，感谢组织的信任和同事们的支持，我由一名没有任何管理经验的普通体育教师破格提拔为体育部副主任（副处），分管教学、科研和体质测试工作。

2010年的武汉大学本科教育处于全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前沿，学校实行学分制收费改革，体育课程作为第一门公共基础课进行试点。2015年，武汉大学更是倡导成人教育统领成才教育的理念，将体育教育贯穿于本科教育的全过程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种改革洪流中，我尝试带领团队对体育教学进行改革，从课程体系的设计、推进，到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创新，再到教学管理流程的优化，完成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立足于提升学生身体素质，培养学生体育精神，致力于体育回归教育的本质。通过完善课程考核体系、加强课程资源建设、加强教学团队建设和强化教学管理的一系列措施，学生体质水平和体育能力明显提升。2016年1月26日，国家教育部网站以“武汉大学多措并举加强学校体育工作”为题报道了我校体育工作，充分肯定了我校体育教学改革的基础性工作。2017年，我主持的教学成果《体育回归教育——基于树人理念的大学体育教学创新与实践》获得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

令人欣慰的是，从2015年开始推行的课内外一体化的课程考核体系初见成效，学生在课外时间依托“汉姆运动”APP进行的珞珈环跑（每周二跑）已经成为同学们的作息习惯，平均每天6500人使用“汉姆运动”进行中长跑锻炼，川流不息的珞珈夜跑成为学校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课内外一体化考核推行五年来，学生耐力素质明显提升。

我的信息管理学科背景在教学改革进

程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优化教学管理环节和流程的过程中,将选课管理、成绩管理、校园环跑、体质测试、网上理论课考试等各个环节纳入信息化管理体系,学生通过武汉大学体育管理系统能够实时查询到与自己相关的各项体育指标数据,并得到体质测试预约、运动处方指导等服务。

参政议政情

2013年9月,经过组织考察,我有幸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2016年5月,根据党派工作需要,我被推选为民进武汉大学基层委员会副主委。期间,2014年10月~2015年10月,被民进湖北省委会和武汉市委统战部推荐到汉阳区文体局挂职交流,担任副局长一职,这是一段与以往完全迥异的工作与生活体验,我经历了从一名高校教师和学校体育基层管理者到社会体育基层管理者的角色转换和体验,这是一段奇妙而愉悦的经历。短短的一年间,我重点调研江城健身e家汉阳江堤店的运营情况,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方案;策划武汉大学体育部与汉阳区文体局的双向交流互访,促进双方在教学科研和实训上的合作;策划武汉大学、汉阳区统战系统社区文化科技行,促进武汉大学统战系统与汉阳区统战系统的深度交流;促进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和汉阳区江欣苑社区在互联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面的合作,协助湖北省首

届互联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高峰论坛的举办,促进双方在大学生文化创新创业基地、专家工作室、产品产业开发、生产性保护等方面的合作。一年的挂职锻炼经历使我接触到更多的基层实际情况,了解到政府在一些政策制度上的初衷和实际执行方面的落差,认识到一名党外代表人士应该如何更好地进行参政议政,更好地进行民主监督。

2016年年底,经过组织推荐和严格考察,我成为一名光荣的市政协委员。任职以来,围绕体质健康、体育教育等领域,我积极建言献策,与相关职能管理部门多方沟通,努力推进提案的落实与落地。为了充分利用环东湖区域自然环境资源,提高广大市民的生活质量,提升武汉的城市形象和美誉度,增加城市粘性,我提出《关于建设环东湖山水体育圈,培育山水体育文化的建议》;为了督促高层次人才进行适当的运动,及时发现某些潜在的亚健康状态,倡导治未病的新观念,我提出《关于在高层次人才健康服务体系中增加体质健康测试的建议》;为了解决武汉市从事网球运动的青少年人



2018年,孔军(右)主持民进武汉大学基层委员会会议

才匮乏问题，擦亮武汉网球这张城市名片，我提出《关于进一步推进青少年网球运动的建议》。另外，立足专业基础，我撰写了多篇关于全民健身和社区体育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学校体育发展等方面的调研报告，受到肯定和好评。

新冠抗疫事

2020年年初的一场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武汉人民的生活，也改变了武大学子的学习状态。

作为一名基层教学管理者，我的第一职责是按照学校的要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组织教师指导学生进行体育锻炼。为此，我调整思路，策划制定《2019-2020 第二学期延期开学期间体育课教学工作实施办法》和《体育课网络教学工作补充办法》等教学工作方案，提交体育部党政联席会通过并予以实施。工作方案结合体育教学的特点，将课内教学与课外指导有机结合，将线上直播和线下运动打卡协同整合，切实达到疫情期间“不停教、不停学、不停练”的教学效果。体育部87名教师在疫情期间的教学组织井然有序，学生到课率及互动情况良好。体育课线上教学的广泛开展对教学管理和服务保障带来了挑战。我策划设计小程序帮助学生通过“珞珈体育”APP快速联系教师，进入班级学习；制作“体育课改选登记操作说明”，为正式开学后学生体育课改选工作做好充分准备；面对学生在体育课程方面的大量咨询，为了高效高质地完成好解释和沟通工作，我策划制作“延期开学期间体育课教学管理有关问答”，全面汇总学生可能会面临的问题，解决学生的实际困难。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课程的质量和有效解决教

师在线上教学方面遇到的问题，我与教学管理的同事们努力借鉴和归纳技术经验，搜集典型案例，在教学群里进行分享、交流。

作为一名教师，我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7个班的网球课教学工作。疫情期间，我在网球课程组制订的教学计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教学方案，与同学们一起度过了难忘的“线上网球”时光。每周的网球课成了我与100多位同学的特殊约定，同学们的投入与家长的支持令我非常感动。很多同学是全家总动员，妈妈帮着找器材，爸爸帮忙录视频，兄弟姐妹帮着挥拍+绕圈练习的计数，一人的网球课成了全家的网球party。看到同学们的投入与进步，我感到莫大的满足，体味到与实体网球课教学不同的感受，线上网球课的师生互动更为频繁，信息交流与感情沟通也比实体网球课更好。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我积极参与到防疫抗疫的战斗中，主动报名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疫情防控突击队，风雨无阻72天，每天坚守楼栋，尽心尽力做好武汉大学工学部第8网格疫情监测、应急处置、物资运送、离退休教师帮扶等工作。在疫情期间无惧风险，逆向前行。

（孔军：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委员，武汉大学体育部副主任）

我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平凡经历

◇ 邓小妮

2020年1月初，考虑到寒假即将来临，我打算假期去深圳看望帮小妹照看孩子的父母双亲，于是很快买好了去深圳的高铁火车票，准备1月22日出发。如果不是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突然来袭，我应该是在深圳和父母弟妹们一家团圆过着幸福祥和的春节。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明确提出新冠病毒肺炎存在人传人的情况。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此时去深圳不合适：如果我感染了病毒，可能会传染给一同坐车的人，并将病毒带到深圳；或者我坐车也有可能被感染，并将病毒带到深圳。当晚，我果断地退掉了往返火车票。1月23日，武汉封城。顿时，各种信息不断传来，有些人在抢购、囤积食物，我们也在惴惴不安中度过了除夕和大年初一。当时想着遵循指导，宅在家里不到处跑，就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最好的防控办法。

1月26日，民盟武汉市委发布通知，让盟员们积极行动起来应对疫情，并在疫情防控中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我开始动员民盟武汉商学院总支的盟员们积极建言献策，并带头提交了社情民意信息《关于在当前疫情下加强对市民心理健康辅导的建议》，总支盟员们也踊跃向民盟武汉市委提交有关疫情防控的社情民意信息，同时组织盟员捐款给有困难的社区居民购买防疫用品。

2月初，我住的小区有人感染新冠病毒肺炎的消息开始陆陆续续在微信群里传播，新冠病毒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近，人们开始变得惶恐不安。与此同时，市委、市政府号召各单位职工下沉社区防控疫情。为响应号召，武汉商学院组织教职工自愿报名下沉社区，我是第一批报名的，并由市防疫指挥部统一安排调配。其实，在报名之前，我心里

还是有点忐忑不安，但思量着与其宅在家里莫名其妙地恐惧，还不如到社区、到外面去了解情况，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在社区下沉工作一段时间后，自己对病毒的恐慌情绪也烟消云散了。最初，我被安排在汉阳区五里墩街五湖里社区，并由社区分派具体任务。社区安排我们做消杀工作，主要是针对老旧居民区以及有发热病人的楼栋进行消杀。

2月11日起，全市范围内所有住宅小区开始实施封闭管理。为方便工作，市防疫指挥部对下沉人员进行了重新调配，我被安排到汉阳区五里墩街五墨里社区。社区分派我们在老旧居民区值守，每天从早晨7点到傍晚7点，我们就站在路口，主要工作是劝导居民尽量待在家里，不要随意外出。2月17日，各小区实施了更严格的封闭管理措施。我们被安排在杨家东湾91、93号值守点值守，主要工作是逐家逐户给居民排查体温、对因病就医等特殊原因需要进出小区的居民进行体温测量登记、给居民家里送菜送粮食送药等。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社区接了一通电话，社区书记在旁边听到我跟居民的通话后，认为我说话语气温和，有经验，且政治意识强，就安排我在社区接听居民来电，并帮助解决各种具体问题。于是，一部热线电话就成了我的主要抗疫工具。

五墨里社区是个老旧社区，居住着1万多名居民。实行封闭管理后，各种具体问题也开始接踵

而来。“有事情，请打电话找社区。”在这个特殊时期，社区成了居民可依赖的温暖港湾。刚开始，我每天要接100多个电话，最多的一天接了将近200个电话。直到3月底和4月份，每天来电才降为三四十个。由于我的左边耳朵曾经受过伤，听力不太好，主要靠右边耳朵接听，电话听多了，右边耳朵就会发热疼痛。

每一次的来电，我都会认真地记录下来，到最后，记录下来的事情有厚厚的一大本。

在接听热线电话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意识到，我的工作不仅仅是接听电话那么简单，而是首先要及时了解国家及省、市的疫情防控政策以及各项政策动态调整情况，其次是要掌握不同工作的各项流程，再次是要及时处理好居民的需求。实际上，居民的需求多种多样，再加上封闭在家时间长，多少都会有些不满的情绪，任何一句不恰当的语言或不当的处理办法，都有可能引起矛盾和冲突。因此，我在接电话及处理问题的时候，



2020年3月，邓小妮委员在社区防控值守

思维一直处在高度集中状态，确保自己言语以及处理方法适当。

当然，每一次的来电，也意味着一件具体的问题需要马上安排和处理——联系车辆安排危重病人及时就医、联系社区安排给重症病人买药、对情绪不稳的居民进行安抚疏导、对需要进出武汉市的居民耐心地进行政策宣传、联系志愿者帮居民购买各种生活用品以及蔬菜等食品、联系技工给居民家里维修损坏的电器或水管、安排给孤寡老人和残疾人等送米送菜以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等，诸如此类，每天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会在当天安排和处理完成，绝不会拖到第二天。

随着武汉市疫情防控工作的不断推进，社区居民的需求和要求在不断地变化，我们的工作重点也随之而变，比如，在就医就诊方面，开始主要是安排新冠病毒肺炎病人住院、其家属隔离或安排人照顾，安排车辆接送一些诸如尿毒症之类的危急重症患者去医院就诊。在方舱医院建设好后，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的救治及家属的隔离等问题基本得到缓解，工作的重点转向安排接送非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就医，给重症患者买药，安排车辆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等。在其他方面，小区刚实行封闭管理时，居民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购买食物、药品和其他日常用品；二是封闭在家，心理恐慌不安，需进行心理疏导；三是有某些特殊需求的居民在社区之间流动问题。在武汉市即将解封之前，居民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市区内各社区之间的点对点流动、武汉市内市外的进出流动方面。针对不同的需求，我会采取不同的办法处理。比如说，对于有个性化购物需求的，我会及时联系社区购买并安排送货上门；有些居民感到害怕，情绪不稳，常常打

电话过来，我会耐心地疏导，并积极宣传我市防疫工作取得的成绩，通过正面引导，消除他们的恐慌情绪。记得曾经有位女士打电话过来，当时情绪很不好，我耐心地跟她交谈了20多分钟后，她说：“跟你交谈后，发现我对我们市的疫情防控很有信心，也不害怕了，现在感觉平静了，谢谢您！我以后可以再打电话找您聊吗？”每当听到这些话语，我心里也非常高兴，甚至还有点小小的成就感。

作为一名市政协委员，我以自己参与疫情防控的平凡经历，见证了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从暴发、到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再到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全过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对于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来说是一次大考。正是由于党的统一领导、政府具体负责、医护全力救治、社会广泛协同、公众深度参与，大家各司其职、形成合力，才在短时间内创造出疫情防控的“中国模式”。这一切，充分体现了“依靠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此，我深感自豪。

（邓小妮：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委员，
武汉商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

追思侯杰昌先生

◇ 柯亨玉 文必洋 李德识

编者按：2020年8月7日，著名空间物理学家、教育家，武汉大学原校长、电子信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侯杰昌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武汉逝世。侯杰昌先生立德树人，桃李满天下；潜心研究，科研成果卓著。闻师仙逝，众多学者、同仁作文哀悼。

柯亨玉：永远的怀念

8月7日，立秋，一个气象学上节气的转折点，它并没有带走夏天的酷热，却带来了我人生旅途上的一个转折。这天凌晨，侯杰昌先生离我们而去。侯老师是我的恩师，从此，我们师徒阴阳两隔，天各一方，后面的路，还有遇到的问题，我该去哪里向他讨教？

恩师在我心中是永远的长者。对侯老师的思念把我带回1986年的秋天，那年我

有幸考入武汉大学空间物理系黄锡文先生名下攻读硕士研究生，而侯老师是空间物理系的主任，也是直接从讲师破格晋升教授的学术大家。按常理，我与侯老师几乎少有交集。

记得9月开学后的某一天，我在空间物理系门口（现武汉大学行政办公大楼东）为即将开始的生活发愁（一家人没有住房，小孩没有武汉户口）。正在这个时候，一位40岁左右、目光如炬、充满活力的中年老师，推着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其他均响的破旧28型自行车径直走到我的跟前，跟我“闲聊”。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伙计，报到了吗？在发什么愣呀？”第二句话则是：“你的数理基础可以，《数学物理方法》考了98分，为研究生阶段学习与选题奠定了好基础，别被眼下的困难搞乱了阵脚。”我心里有些纳闷，这是哪位老师？咋对我

的情况如此清楚？陡然间没有了距离，发自内心的亲近感油然而生。我心下觉得站在面前的俨然是一位可信赖的长者。

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名冠武汉大学的侯杰昌，空间物理系的主任。自那以后，每次见到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我心目中的大人物，他仍然以“伙计”称呼我。我们聊天的内容也从读了什么书，有什么体会，有哪些新研究，扩大到了小孩谁接，煤票（当时煮饭烧煤，计划供应）有没有。

从此，我心里多了一位父亲般的长者。没过多久，系办公室主任通知我去系里领取煤气炉，说这是系里侯主任为我争取的。此后人生中再遇到困难和坎坷，每每想到侯老师的关怀和教谕，心中就增添了踏实和勇气。

恩师在我心中是永远的智者。随着与侯老师交往的增多，他的谨慎、博学、睿智令我们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倾倒，向他请教问题的次数越来越多。某些时候，我们研究生担心对他打扰太多，而他则大笑说：“我这块阵地无产阶级不来占领，资产阶级就要乘虚而入，你们可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呀。”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他办公室向他讨教，恰好有个职能部门正要向他汇报相关事情，而他仍然优先与我们研究生讨论问题，然后再听职能部门汇报。侯老师专门交代办公室人员只要我们去，可优先直接去他办公室找他。后来，有一次聊天中我问他，这样优待我们研究们（侯老师口头语称研



1993年，侯杰昌先生（左）为空电系学生颁发毕业证

究生为研究们），职能部门可能会有想法，这样是否不妥。他说：“因为有你们，这里才是学校，学校是为你们服务的。”这也让我们有了学校主人的感觉。

侯老师执着于学问，执着于学校传承智慧的使命，是我们所有人在科研和教学事业上的榜样。在我的印象中凡是向他讨教，每次都会收获满满，从没有不满意的答复。遇到问题，侯老师总能抽丝剥茧，旁征博引，用他那独到的智慧揭示本质，解开我们的疑惑，不管是在求学上还是在工作上，向他讨教和讨论问题真是一种享受。

恩师在我心中是永远的仁者。他随和、慈祥、博爱，永远那么富有亲和力。他热爱学生、热爱学院、热爱学校、热爱事业、热爱国家和人民。记得20世纪90年代，学校周边环境堪忧，他主动协调各级政府，主持和推动学校周边环境综合治理，没有白天黑夜，终于使校园回归了原有的宁静和美丽。

2002年初春，电子信息学院学生宿舍失火，他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不顾年事已高，指挥灭火，查看灾情，逐个督促落实解决学生困难，直到问题都得到解决才离开。他所表现出的那种对学生的仁爱之心，永远是为师之人的榜样，令我们晚辈汗颜。

秋天到了，接着就是冬天。我心中对恩师永远怀着无尽的思念。唯愿我能弘扬恩师精神，传承其衣钵，是为纪念。先生千古，风范永存！

文必洋：“我就要露馅了！”

2020年8月7日凌晨，武汉大学原校长侯杰昌教授与世长辞。距侯老师病危至今已一月有余，对于这一天的到来，虽然已有心理准备，但听到这一消息时，仍然心中一震，不禁悲从中来。

我从1990年开始跟随侯老师工作与学习至今，已整整30年。侯老师虽然走了，

但浮现在眼前的，仍然是那张永远微笑着的脸。看到侯老师的笑脸，悲伤似乎顿时减轻了很多。

侯老师性情温和，在他身边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似乎永远不用担心挨训受骂。侯老师即使与自己的学生讨论问题，也永远是一副平辈人的口吻。记得有一天，我把博士论文初稿给他审查，他随手翻阅着，眼光停在了一个公式上，是一个由直角坐标转换到极坐标的积分公式推导。眼光只停了大约2分钟的样子，他就说，这个公式似乎有点问题。我一听说公式有问题，心中有点慌，赶紧凑过去看，是一个打印错误，不仔细推敲，应该不容易发现。我知道他以前并没有看过这个公式，就想和他开个玩笑，说：“这个公式是我仔细推导的，应该不会错啊。”他说：“无论是极坐标还是直角坐标，最终的物理量纲是变不了的。”“老兄，你这公式左右不平衡啊！”从此，再与先生讨论问题或者提交报告时，

我特别注意公式校对，不敢有丝毫懈怠。老师深厚的数理功底令我无比佩服。

侯老师学术功底深厚，视野宽广，是我国著名的空间物理学家。虽然是学术权威，但他指导学生从来不设条条框框。侯老师对研究生的指导属于放养型。他对我说过很多次：“本科生导师，对本科生的问题要基本能回答；硕士生导师，对硕士



2011年，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组建10周年之际，侯杰昌先生（左）与魏奉思院士合影

生的问题，要有一半能回答；博士生导师，对博士生的问题，应该都回答不了。”意思是，博士生要研究没有答案的新问题。侯老师的这一观点，也成为我指导研究生的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不限制研究生的具体研究路线。同时，也成了我学业不精的“挡箭牌”。我的学术水平完全符合我的导师对我的教导，“对博士生问的问题，我基本都回答不了。”但遇到“不懂事”的研究生，尤其是在电波传播和电磁场方面遇到问题，学生坚持要和我讨论时，我只好“搬救兵”——找侯老师帮忙解答。侯老师，您这一走，我再遇到“不懂事”的研究生该怎么办啊，我就要露馅了！

老师，我也知道，这几年，您深受病痛折磨，想早点休息了。您去陪伴师母，去找您的“沈力姐姐”了。您见到沈老师，请向师母转达我的问候，我也好想念沈老师。写到这里，我已经满眼是泪，看不清屏幕了。

我敬爱的导师，天堂没有病痛的折磨，祝您一路走好！

李德识：和蔼可亲的老师和前辈

在我心中，侯杰昌老师从来都是和蔼可亲的老师和前辈。侯老师是我的博士后指导老师，可我从来不敢对外宣称是侯老师的学生，一方面因为侯老师是校长，更重要的是怕辱没了师名。

2001年博士毕业后迷茫的我，得到学院时任院长柯亨玉教授的关心，他帮助联系侯老师和曹阳老师做我的博士后导师，从通信和测控方向跨学科进入地球物理学博士后流动站。在两位老师的引领、指导和鼓励下，我才慢慢学会从技术研发转向做传感

网、水下通信网络和物联网的研究工作。每次见到侯老师，他总是问最近有什么新的进展。所以见老师也是对自己的督促，总有一些拿得出手的研究工作给老师报告。

每次春节前带领学院班子成员去看望老师，一定要汇报一年来的工作，包括学科评估、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改革创新、学院大楼建设等。因为每年都有进步，老师每次都高兴地说：“好！”而且拍着我的肩膀给予鼓励，就像父亲一样。2020年1月16日，班子成员一起到中南医院看望老师，老师一直在睡，我们不忍心打扰，就在床前等了半个小时。没想到那竟是最后一次见面，准备好的让他高兴的事情都没有说。两个月前，已经得知老师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可是因为担心影响他的休养以及工作原因没有去，留下了终生遗憾！

老师是围棋爱好者。七八年前，有武大围棋协会的朋友听说老师与我相熟，就约了老师和张肃文先生一起小聚，听二位前辈谈棋、谈前沿技术和人才培养。二人兴致很高，十分平易近人，让我能够近距离感受大师的眼界，聆听他们的教诲，受益匪浅。张肃文先生是侯老师的老师，饭毕，侯老师一定坚持要先送张先生回家。那时侯老师已经七十余岁，又是老校长，他尊敬老师的做法又给了我们亲身示范。如今老师驾鹤西去，他的精神和开创的事业是我们永远的财富。侯老师千古！

（作者均为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教授）

抗美援朝战争中我的片断往事

◇ 闵永安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遵循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抗击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打出了国威军威，捍卫了祖国边疆，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保障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稳定发展。

我现年已九十有二。当年，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政治部民运队排级民运队员，每每回忆起在朝鲜战场上战斗、生活的往事，都忍不住思绪万端，泪眼婆娑……

不到时候，莫说过江

1950年8月1日建军节那天上午，民运队孙队长突然找到我，说：“晚上民运队要去参加安东市在镇江山公园广场举行的军民联欢庆祝八一建军节大会，你要代表全军青年战士在大会上讲话。”我当时一愣，怕讲不好，就说：“我不行，你另找别人吧！”“大闵，这是给你的政治任务，你

一定要完成好。”一听这话，份量很重，我无法推辞，只得说：“那好吧，讲什么呢？当前朝鲜形势紧张，我们很可能要同美国作战，怎么说，你给我说个提纲，我去准备。”孙队长想了一下，说：“主要是借这个场合表表态，现在绝不要说我们要过鸭绿江，别的你自己掌握。”我当时想，偌大个军政机关为什么偏要民运队出人去讲话，有百十来号人的民运队为什么又偏点名要我去讲，估计是上级首长的意思吧。没办法，只有硬着头皮上。一上午，我就在揣摩这个讲话的内容，打腹稿。我觉得讲话不能照稿念，一个20岁的青年战士代表，应该是朝气蓬勃的，干净利落、简短明了地表个态，时间掌握在10分钟以内。

黄昏时分，民运队全体集合到镇江山公园广场参加大会。公园绿色葱葱，会场气氛热烈活泼，大会由安东市组织，参加者有安东市各级领导和各地方单位的男女青年及我40军军直机关首长和全体人员，估计全场有万把人，军文工团还准备了文艺节目

演出。见黑压压的人群一片，我心里又有点紧张起来，孙队长让我“别紧张，大胆讲”。我想也是，既然已准备好，还怕什么。我稳了稳神，压住忐忑的心跳，等地方领导讲话完了，主持人宣布：“青年战士代表闵永安同志讲话。”我轻松地跳了起来（当时大家都围坐在广场草坪坡上）走到场中央就开讲，心没慌，更没结巴，反正想到的都是如安东市群众如何拥军，军队负有的任务，以及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本性要提高警惕，如果胆敢侵犯我国边境，我们就要它在国境线上死亡，等等。讲了估计有七八分钟的样子，总算完成了任务。回来，没挨批评。隔天，队长递给我一张地方报纸《辽东大众》，说：“你的讲话记者摘发了，还不错。”我赶紧捧起来读，虽然我的许多讲话被删节了，只摘发了最后一段，但不管怎样，这是我第一次上地方报纸，我将它剪下珍藏了起来。

跨过鸭绿江

天天盼着入朝作战的命令，在1950年10月18日早晨终于传达下来：明天晚上，40军民运队要随我军司政机关等部队一起过江入朝作战。

下午，我给家里写了封家信。我想，这一过江与装备现代化的美帝作战，必然是激烈的、残酷的，个人生死茫茫难以预料，作最坏的打算，这封家信也可能是最后一封了。信写完后，我请了个假到街上去寄信，顺便看看市里的街道，要走了，在祖国的土地上再走走，算是和祖国告别。我还到老城区去吃了一碗鸡丝馄饨和三个葱油馅饼，这是安东的名小吃，吃在口里，想在心里，让我在异国他乡也能感受到祖国的温暖。

10月19日上午，我把战斗行装准备就

绪后，就仔细擦拭我的三八盒子手枪，每个零件都拆卸下来，精心地一点点擦拭，擦得一尘不染，这是我心爱的武器，在解放海南岛时我就带着它。那时，民运队许多同志都配有既是防身也是迂敌作战的轻武器手枪。下午，好好休息睡了一大觉。17时开饭，食堂加餐，少不了猪肉粉条大白菜。饭后，大家赶紧将借老乡的物品一一归还清楚，准备出发，迎接战斗。19时左右，我们全队同志都武装整齐列队集合完毕，向镇江山公园广场军指挥机关集结地集结。

部队是秘密过江作战，安东市没有组织群众欢送，街上也没有什么行人，两边的商店都已掩门关店，偶尔有三两个人站在屋檐下，笼着手看着部队行进。天气已凉了，寒风一阵阵吹过，只有微黄的路灯在寒风中摇曳。这时，我心中猛然涌起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感觉。我想，这一去我可能战死在异国他乡，但我所热爱和无限信任的部队，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指挥下，一定会打败美帝，胜利凯旋的。那时，在祖国大地上将会万人空巷，鲜花像海洋似的欢迎祖国英雄儿女们胜利归来。

镇江山公园广场黑压压地挤满了部队，许多同志在黑暗中碰见自己熟悉的战友，热情地相互打招呼，有的还探问着这一次出国打仗究竟能打多久，有的说朝鲜充其量只三千里江山，打不了多久；有的笑着大声说就准备了一条牙膏，顶多打三个月。大家瞎议论，谁也说不清道不明。不久，夜空中响起出发的军号声，接着前后此起彼伏的军号声响起，部队已经蠕动，那些驮着迫击炮、重机枪的骡马，不时发出长长的嘶鸣，使寂静的夜空增加了兴奋的临战前的色彩。

部队沿铁路向鸭绿江大桥前进。大桥以桥中间为国界，双方桥头有警卫，桥中间

也有双方的警卫。当我们踏上大桥，看见桥下奔流的鸭绿江水，都不禁回头再看看还在闪烁着微黄灯光的安东，我情不自禁地轻轻唱起苏联共青团员之歌：“……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差点发生误会

40军首捷温井之后，民运队五分队接到任务，到楚山郡丰面（镇）去筹集粮食和收容失散掉队的同志。首长指示，路上可能还会遇到被打散了的敌人，为了安全，给我们配置了一个加强步兵班（只多了一挺轻机枪），如碰到敌军可以对付。

夜晚上路，天很黑，几十米远就分不清物体。天气很冷，刚刚飞了一场小雪，路面有点上冻，我们都穿着冬装，毛皮靴踏在路上嚓嚓作响。深夜1时许，当我们离丰面还有几里路的样子，突然，前方百把米远的地方，传来大声的呼喝声和命令声，好像是朝鲜话，我当时和几个战士走在前头，连忙跳下路边沟里，大声反问：“你们是什么人？”心想莫非遇上了南朝鲜的敌伪军？由于天太黑，看不清前面的情况，只听见对方有跑动和拉枪栓的声音。这时，我对弯腰跟上来的翻译小李说：“你赶快大声问问，对方究竟是人民军还是李承晚（指敌伪军）？”翻译跟他们对答了几句，说：“他们是人民军。”“你让他们过来两个人。”我不放心地说。我觉得对方如果是敌伪军，他们已听明白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绝对不会过来人。不管敌我力量对比如何，“狭路相逢勇者胜”，那就得开火，气氛紧张极了。这时不管谁先扣动扳机，遭遇战就发生了。幸好，对方是朝鲜人民军，而且还边走边喊着话过

来了两个人，并激动地拉着我们的手连声说“中国道木、中国道木”（中国同志），我们双方由紧张变成了会师的喜悦。原来这里守着人民军一个排，他们是掩护人民军撤退的最前沿阵地，人民军总部也已靠近鸭绿江边，他们还不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取得温井大捷和在古场全歼敌伪军，部队已向前发展的情况。他们的少尉排长听说后，连忙去摇电话，向上级汇报情况。

这次夜闯人民军的前沿阵地，幸未开火，好险！

中朝人民情深谊长

第二次战役结束时，北朝鲜土地包括平壤等城市大部分都已收复。我军民运队进到新溪附近。当时，我们还没有空军参战，敌机控制了制空权，非常猖狂，我方所有交通线路都遭受到敌机轰炸、封锁，造成部队给养极端困难。这时，领导决定让民运队在新溪临时设一兵站，负责接收晚上由后方送上来的弹药粮食。等后勤兵站跟上来后，就交由他们去管。这个任务上级交给我和李旭东带着一个班的战士去完成。我们连夜赶到新溪，在离新溪公路大桥不远的一个小山洼，有几户农家，我们就安顿在这里。当晚，我们没休息就带着人员沿山去寻找可存放和转运物资的地方，大约走了1里多路，有一个大山坳，找妥地点布置好后，天已见微曦，人冻得像个冰人。这一年朝鲜的天气特别冷，温度在零下三四十度，真是流水成冰的日子。我们工作了一夜，身上又冷又饿，冻得哆哆嗦嗦，两条腿沉重得迈不开步子。回到大娘家里，一推门，一阵热浪扑面而来，大娘、大嫂早已把地炕烧得暖暖的，正在炕边等

着我们归来。我疲倦得要死，顾不得说什么，脱下湿漉漉的毛皮靴倒在炕上就睡着了。

天大亮了，我拿起皮靴一穿，暖烘烘的热气，舒适极了，原来这是大娘、大嫂们连夜把我的毛皮靴烘烤干了。我感动极了，连声道谢。

中午，大娘给我们安排午饭，一大铜碗白米饭，一碟酸菜，一碟黄豆，酸菜很好吃，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朝鲜传统名菜。

在朝鲜，我们分散执行任务时，都在朝鲜老乡家住，由朝鲜老乡安排供应饭食。我们有米时，就按定量给米，没米时，就给老乡打白条，上面注明部队番号，注明几个人吃了几餐米饭，签名后交给老乡，作为他们将来向朝鲜政府交公粮时顶账（以后起没起作用我不知道）。朝鲜老乡对供应志愿军饮食都很热情，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储备菜，泡的酸菜也不多，但总是尽量满足我们，像对待亲人一样。

在新溪工作了约一周时间，我们完成任务回队了。我住的这家老大爷已经去世，儿子参加人民军打仗到南边去了，现在在哪里还没有消息，家中只有老大娘、儿媳妇，还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我们临走时，她们全家依依不舍地相送，使我深深感受到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浓浓的爱戴之情。

回队后，我又接受任务到平壤以南的沙里院去了。等过了一个多星期再回队时，队里同志交给我一双用美军军用手套改织的新毛袜，说是新溪老大娘带着小女儿送来的，当时我真感动。我想起在新溪工作时，曾送给大娘、大嫂好几双战场上缴获的美军毛线手套，让她们护手保暖。开始她们不要，后来收下了。隔天，我看见小姑娘把手套都拆洗了，在织袜子，我以为她们手不冷脚冷，没有在意。哪晓得她们根据我

们每晚脱下的毛皮靴大小尺寸，给我和李旭东一人织了一双袜子，而且在大白天冒着被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在冰天雪地里一老一小走十几里路，找到部队交给我们，我还能说什么？用什么样的语言都难以表达我当时感激的心情，一阵热流暖遍全身，一股热泪夺眶而出……

我没有时间再去新溪了。因为在1950年12月31日夜，我军的第三次战役开始了，我军将突破三八线，为解放汉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向南大举攻击。

这双用美军军用毛线手套改织成的袜子我一直穿在脚上。1952年10月，我在开城前线负伤被炸掉右腿时，受伤的脚和袜子已被炸飞不知去向，只剩下左脚一只袜子，我脱下来细心地珍藏起来，它是我毕生永远难以忘怀的纪念。



1952年冬，闵永安于朝鲜留影

在南朝鲜村庄征集粮食

第三次战役结束没几天，接着又发起了第四次战役，在南朝鲜境内进行了横城反击战。

部队深入到南朝鲜地带后，基本断粮。我也饿了一天半肚子，粒米未进。横城反击战一停，上级叫我连夜到离部队驻地三四里路的一个村庄去筹点粮食。这是个不知底细的村庄，有无敌人、有无粮食心中无数，再说南朝鲜人对我军并不了解，有敌视心态，完成这个任务，真的是难度和危险极大。

那是一个天上有弯月、有星星闪烁的寒夜。行不多久已看见有个村舍在月光下影影绰绰，村庄约有三十几户人家。忽然，我发现村头有一户人家屋内有灯光一闪，“有人，大家小心。”我一边说着一边布置了几名战士包抄到这栋屋后以堵住后门，我则带着几个人从前门围过去，“主人在家吗？”我温和地叫门，灯光一闪，熄了，室内还有一阵慌乱声响起，朝语翻译也喊着：“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请你们把门打开！”仍然没有应声。突然，“叭、叭”，后面响起了几声枪响，“站住、站住！”这是我刚派去守住后门的几位战士发现有人企图从后门往外跑发出的警告。我顺声一脚把前门踢开带人冲了进去，用手电筒一照，靠墙坐了七八个老老小小的男女，我转身又迅速把侧门踢开，室内竟然有六七个穿便衣的壮年男子挤在一起，我命令他们不许动，经过询问得知都是南朝鲜伪兵，被我军击溃，刚躲在这里换上便衣想逃跑。经我们搜查没发现武器，我觉得这仍属被打散了的敌军，就派三名战士把他们押回去。

我开始和老乡们交谈，他们对中国军

队根本不了解，谈了好久都谈不明白，我就对翻译说：“你问问，他们哪一家是贫农？”“贫农？”他们莫名其妙，我想着好笑，贫农这词本是我们国内搞土改分田地划成分的词，一时急了，用在这里，他们当然听不懂。我改问：“这里谁家没有田，谁家是给财主打工的？”终于他们说出一个人来。我派人把他找来，说明我要征集一批大米，要他挨家去动员找一些来。此人究竟是什么人，当时无法去查，我的任务就是征集粮食，当晚就要赶回部队。这人点头哈腰倒显得热情，挨家跑了一趟，只弄来300多斤稻谷。我要的是大米，他弄来稻谷，让人啼笑皆非。时间来不及去纠缠，我叫老乡们马上利用自家的土石臼把稻谷舂成米。一时，有七八户人家响起了舂米声。整整折腾了一夜，快天亮了，我把舂成的糙米归拢起来，为了在天亮前归队，也不再勉强老乡送粮，我们几个人连忙分别扛起来，留下一张收条就走了。

寻找、接应失联部队

那天中午时分，我刚把征粮任务完成回来，下午部队整装北撤，我也准备和部队一起走了。这时，只见带我和蔡小樵一起下到部队的军民运部正营级干事谷纪新急匆匆地过来对我说：“大闵，给你一个重要任务，由于我军临时决定北撤，时间紧，任务急，前面还有一个营的部队没有通知到，失去了联系，团里已抽不出干部来带人去寻找，现在决定让你去，给你一个加强班。”说着他就摊开手中的地图，“从这里插出去，往左上这条小路，顺路可走上一条公路，上公路后，不要往北走，防止敌人在洪州一带出现，你只能往南插进去，是敌军的范围，

需隐蔽潜行，约七八里路，可到达公路穿山而过的一个垭口，就潜伏隐蔽下来，等待和接应那支失联的部队，到夜晚10点钟，不管接没接到部队，你们赶快撤回追上我们，如遇敌情，你要随机应变。”说完，留下他的通讯员和一位朝语翻译，他就随团机关匆忙后撤了。

突然接到这样重要而极危险的任务，我心里确实是有些紧张，部队往北回撤，我却要带队南进，往敌人肚子中钻，太危险，何况我只是一个做政治工作的民运干部，非直接作战的指战员，可这是命令，只能无条件执行。

我点点来到我身边的这支小部队，战斗人员共18人，配备有一挺轻机枪，一门小六零炮，火力还可以，加上我身边的通讯员小张，他挎着一支美式卡宾枪，还带了4枚手榴弹，还有朝语翻译朴同志，总共21条汉子，也算得上是一支火力较强的轻骑武装队伍了。如果真与敌人遭遇，不管敌人多少，较量几个回合没有问题，因为我的这些战士，都是刚解放海南岛后随军来到朝鲜的老战士，士气高昂，作战经验丰富，打起来即使不能以一当十，至少也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天已渐渐暗了下来，星星在空中闪烁，眼看大部队已悄悄北撤而去，我对班长说了声“出发”，就带着这支精干的小部队顺着山沟小路往南潜进，往左出了山坳，出现了一片白雪覆盖的稻田，不见村舍，也不闻鸡犬之声，天寒地冻，大地静寂，只有我们这支队伍踏着雪的响声。往南插过去，又进入了一条山沟，朝鲜的土地是山多平原少，钻进山沟翻过山坡，又见一条公路。此路往北可经洪川到春川过汉江，越过三八线可达平壤；往南则是南朝鲜的横城、原州等地，如

再过三七线，就更深入南朝鲜的腹地了，这两头敌情都很复杂，是敌军驻守和运动攻占的方向。我带着这支部队趁这条路暂时是真空地段，迅速通过往南前进。

部队以战斗的姿态警惕地搜索着南行，大地静寂，四周不见一个人影，只有风吹树摇的呼呼声。走了一阵，翻译朴同志把我衣袖一拉：“排长，不能再往南走了，再往南就很危险了。”这话虽然是提醒我，但是看他紧张不安的脸色，就知道他害怕了，但不能责怪他，我安慰道：“指定的地点还未到，失联人员也没找到，不能停下来，不能打退堂鼓。”说着就岔进一条小路，继续往南前行。大约晚上7点多钟，我在一个公路垭口停了下来，按地图标示我已到达预定地点。这是一个山坡的高处，往南是下坡，南边如有人来，须爬坡而上，而我们居高临下，地势优，眼观四方，可守也可防偷袭。我让部队人员分两边隐蔽起来，做好战斗准备，如发生敌情可随时开火。我隐蔽潜伏的地方，正面是横城、利川、原州一带，是敌军驻守，左前方是新坪里地带，离我们仅3里，往右前方是苍松里地带，离我们2里许，前面有敌，左右有无敌军我毫不知情，也不能派人去侦察，怕情况没摸到人却丢了。我对站在我身旁的通讯员小张说：“管好你的马蹄钟，到10点马上告诉我。”

朝鲜这年的冬天冷得出奇，夜晚温度总在零下二三十度，我们这支轻骑队伍隐蔽在这里，又是个山路高坡，群山环绕，手脚冻得像刀扎似的疼，四周安静得只有寒风的呼啸声，好像一场大战即将来临。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忽然我隐约发现山坡下有一队人悄无声息地沿坡路向我方走来，不知是敌是友，我立即向隐伏的战士们下命令：“有情况，准备战斗！”战士们揭开手榴弹盖，

枪口对准了来人，大约有百把米远的样子，我大声向下发出询问：“什么人？哪一部分的？”心想，如果无人回答，或者答出的是外语口音，就立即开火。这时，只见下面的人迅疾卧倒，发出一片枪械相互撞击的声音，接着有人高声回问：“你们是什么人？”我一听，中国话，是自己人，又谨慎地追问了几句，对方回答正确，是自己的部队，我就从隐蔽处站出来，让他们赶快上来。原来，这正是我们寻找的那支部队。他们是先出发的侦察尖兵，我忙问：“你们部队呢？”“在后面！”“快派人去把队伍叫过来。”随即有两个战士迅速向后面跑去。不多一会，只见齐刷刷地以警戒状态过来一支约三四百人的队伍，沿路两边警戒休息，有五六位干部模样的人急匆匆上来，其中一位紧紧握住我的手，旁边一人介绍说：“这是我们的教导员。”这位教导员身高一米七几，比我稍矮一点，年约30岁（遗憾的是现已忘记他的姓名），紧握我的手说：“我们奉命前进后，发现情况不对头，敌方并无溃逃的样子，好像还在集结，有向我方运动的迹象，而我方部队一直不见上来，是进是守是退，难以定夺，又不见上级通知，完全失去了联系。后来，我们感觉形势不对，决定先回撤。找到上级取得联系再说。”我连忙告诉他，我是军部专门派来寻找他们的，并将部队全线后撤的信息、意图和北撤的路线详细告诉了他，让他带部队快去追上主力部队。这位教导员激动地说：“这太好了，真及时，晚一步我们可能就陷进敌人的包围圈了，真危险。谢谢，谢谢！”他随即命令部队立即行动，并要我一起走。但我想10点未到，还有点时间，想等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失联人员上来。教导员见状就很关心地对我说：“我给你留一点人吧！”他一眼就看出我

带的人不多，想留点人支援我。“不必了，别让他们脱离你们建制，谢谢！”我说完，望着这支几百人的队伍迅速离去的身影，长长地吁了口气，寻找接应失联部队的任务终于完成了。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下面又上来一支失联的队伍，百把多人，有的身背药箱，有的肩扛担架，队伍中还有十余位女同志，其中有位女同志扎着皮腰带，挂配着小手枪，显然是这支队伍的领导。这是支担负救护和医疗任务的队伍，属哪个部门现在我也忘了，他们的协理员听了我的传达，感激得不得了，带着队伍迅速按我说的路线离去，望着队伍后面背着两个大铁锅的炊事员同志的背影，我真为他们捏把汗，也为他们的行动赞叹，这支没有作战力量的卫生救护人员竟然也因冲在前面而失联，还警觉地知道回撤，真不容易，真勇敢，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女！

我继续警惕地察看四周，没有人影，只有风声，直至10点，才下令撤离。

从参加抗美援朝至今已整整70年了，回想起70年前在朝鲜作战的那些日子，我禁不住热泪盈眶，心中酸疼。写下这些片断往事，以此纪念那些爬冰卧雪、挨饿挨冻、极端危险和艰难的岁月，铭记那些已光荣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战友，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闵永安：长江日报报业集团离休干部）

后湖街道，我的防汛责任区

◇ 汤维钧

2020年8月7日是个标志性的日子，东去的长江水在人们长久的期盼中，退出了27.30米的警戒水位；24节气中的“立秋”如期而至。夏天成为回忆，酷热仍然持续。防汛抗洪这件大事，终于可以让人们松口气了，虽然没有接到调低防汛应急响应级别的正式通知。

从2016年12月开始，我联系江岸区后湖街道，工作内容包括党建责任、信访维稳、文明创建、消防和安全生产等，自然也包括防疫和防汛。我的主责主业在人民政协，后湖也是我的一块责任田。

这是本区最大的一条街道，面积18平方公里，新建小区和城中村交错，共16个社区，居民超过20万人。在抗疫的近90个日夜里，我参与了街道的小区封控与值守、居民生活保供、病患就医转移、逝者安葬协调等工作。战罢新冠，尚未休息，一晃，梅雨季节就到了。

今年入梅以来，武汉遭遇多轮强降雨，至7月中旬，全市平均降雨量764.6毫米，仅次于1991年和2016年，居历史同期第三位。特别是7月5日~6日，武汉出现24

小时最大降雨量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

7月6日5时，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当机立断，提升武汉防汛应急响应级别至Ⅲ级，一个半小时后，再次提升至Ⅱ级。全市“二级响应、一级战备”，气象预警连续播发，渍情通报半小时一次。

雨情就是汛情，汛情就是命令。

大雨是从7月5日晚上开始的，一直没停。6日早晨，区防汛指挥部来不及开会，在工作群里发了个简短的通知，要求区领导立即下到对口联系的街道，督导排渍排涝。同时，区里指定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杰和我一起联系后湖。黄杰副主任担任过后湖街道工委书记，我问他：“下雨，后湖哪里最容易受淹？下大雨，后湖哪里淹得最狠？”他说：“淌湖三村。”

我们去看，果然如此。淌湖三村位于兴业路和建设大道延长线交会处的东南面，这是一处城中村。地铁3号线的兴业路站就在这个交叉口。准确地说，淌湖三村属于后湖街淌湖社区（村）待改造的一部分。这里地势低洼，村里的房子，一楼基本与兴业路、建设大道延长线的路面平齐。我观测，这块

洼地的平均海拔至少比路面低 1.5 米。我推测若干年以前，这里应该是一口水塘或者一口鱼塘。

大雨还在下。我们撑着雨伞，顺着斜坡路来到村里。路面上还有大量积水，村口淌湖三村警务室的一间房被区水务局排涝队临时占用，当作值班、备勤工作间。靠兴业路这边，雨污井盖被揭开，三台电动水泵正把路面的积水往井里抽，但积水却看不出有迅速消退的明显迹象。顺着路边店铺的台阶往东走，到第二个巷口，巷子里路面的积水比较严重，因为地势更低，也因为下水道堵塞。停放在巷里的小车，半个轮子都泡在水里。同行的社区干部、排水站的负责人说，村子东南角的巷子里，积水跟这里差不多一样的。我们原路折返，到村里平行于建设大道延长线的路上，这里停着一台崭新的大型应急抽水泵，随时待命。黄杰副主任和我跟社区干部建议：“可能会淹水的小车，都贴个提示条，提醒车主及时将车挪移至安全地点停放。”又拜托区水务局管排渍的现场负责人多尽点心。

我们离开淌湖三村的时候，雨还在下。当天，长江汉口站水位 27.42 米，府澧河水位 27.47 米。雨下午才停。当天，江岸地区降雨量 84.1 毫米。

府澧河是长江的支流，在江岸的地界分岔，然后汇入长江。后湖街道的防汛就是府澧河流经后湖的 2.8 公里，从三金潭村到岱山村的张公堤这一段。防汛期间，由这两个村（社区）负责值守。

7 月 18 日，大雨下了一整晚没停。防汛形势陡然变得十分严峻。我后来查了区防指的工作日志，19 日当日长江汉口水位 28.51 米，府澧河水位 29.07 米，降雨量 140.8 毫米。

19 日上午 9 时，市、区防指视频会议召开。这天，黄杰副主任防汛值班，也被通知参加会议。防指会议后宣布，武汉市从 7 月 19 日 11 时开始，启动防汛橙色预警。

我不是区防指成员，我的防汛岗位责任在后湖。

8 时 40 分左右，我到达三金潭社区（村）背后的张公堤上。三金潭社区的帐篷里却没什么人，问正在堤坡上林子里巡堤的人，说：“都在前面的堤脚下。”果然不远处聚集着一群人。堤坡的一处围栏被打开，顺着坡子铺上了防汛沙袋，成了一条简易的路，可以下到堤脚边。我走下去一看，街道严书记、闫主任，社区杨书记等几乎所有班子成员都在。他们告诉我，一大早，三金潭村的巡堤人员发现，内堤背面出现渗水，流清水，像泉水，还有点厉害。区水务局堤防段的技术人员正在察看，作技术鉴定。

张公堤在这一段都没有压浸台，紧挨着堤脚的一条水泥路就代替了压浸台。发生



2020 年 7 月 6 日，汤维钧（右）到淌湖三村察看排渍情况

渗水的路段标号是张公堤 3+400 米处，后湖泵站二期工地对面。不到 300 米的这段堤脚，有七八处渗水点，都用小红旗插着做了标记。区里的这位技术人员个子不高，长得还算结实，脸晒得很黑，说话语速有点快。他说，把这圈都围起来，先压 30~50 公分的砂子，再压 30~50 公分的小石子，继续观察渗水情况。

10 时多，市防洪设计院的专家到达现场。这是一个戴眼镜的很精干的小伙子。他在渗水点挖起几锹泥土，蹲下来仔细地看了看，说：“可以排除管涌、白蚁洞侵蚀大堤这一类的险情。”又说，“顺着渗水点开 50×50（公分）的导流沟，先铺细砂，再铺细石，观察渗水情况。”还说，中建三局一公司是泵站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让他们来处置。街道和社区的同志赶紧把三局一公司的施工经理请来，开始投入工作。

约 11 时 30 分，一辆考斯特从张公堤东边驶来，停在后湖泵站的闸口处，车上下下来一队穿防汛雨衣的人，走下堤坡的简易防汛通道，到了这个渗水点。带队的是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市委副书记、市长周先旺，以及市委常委龙良文，副市长张文彤，还有市委办公厅主任、市政府秘书长等。市领导察看了渗水点的处置情况，听取了江岸区防指的简要汇报，指示一定要及早发现、及时处置堤坝险情，坚决保证城市安全 and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晚 23 时，副市长张文彤带领市防指的工作人员，再次来到张公堤的这个渗水点，检查江岸区的防汛抢险工作。

7 月 20 日的《长江日报》第一版报道了市领导前一天的活动情况。副区长熊俊告诉我，市里视频会议后，王书记一行先是检查了七一中学的中考考场，听说后湖

街这边正在处险，临时决定到现场来检查指导的。

20 日上午，我跟办公室的同志商量，从防疫时捐赠给区政协的矿泉水中，搬了好几箱，和黄杰副主任一起，送到张公堤上三金潭社区的值守点，慰问一线防汛人员。我跟社区书记杨运来同志很熟，他快 60 岁了，当了好多年的村支部书记，最近这几次社区“两委”换届，他都是高票当选的。他为人实诚，在社区有威信，深得大家的拥护。

我留心察看了一下帐篷里三金潭社区的防汛日志：当天，长江汉口水位 28.61 米，府澧河水位 29.46 米。站在迎水面的碉堡（这是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抗击日寇的武汉保卫战的实物遗存）顶端北望，府澧河河水下泄缓慢，上游流下来的杂草杂物在河面上漂浮，偶有微风拂面，但风是热的。下到背水面的堤脚，昨天的渗水点已经处置妥当，只有一两处还有点渗水，险情完全排除了。

气温在攀升，阳光暴晒的堤上越来越炎热。巡堤查险的任务依然很重。区总工会为防汛一线职工送来了防蚊药品等礼包，三金潭社区值守点共 50 份，7 月 27 日下午，我和区政协副主席殷书冬同志一起，送到了堤上。

而今，洪峰已经过汉，水位已经回落。30 多天防汛的日子里，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帐篷值守、巡堤查险，但我目睹了街道、社区干部的日常作为，他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气概，时常让我激动不已。英雄的武汉，英雄的武汉人民，一仗接着一仗打，历经磨难后变得异常强大。我是武汉的一分子，在职业生涯中，能有这样一段经历，足以让我自豪。

（汤维钧：江岸区政协主席）

民国时期的武昌沙湖讼案

◇ 李焱胜

历史上，武昌沙湖（旧时曾称余家湖）曾与长江相连，其范围随江水涨落、泥沙淤积而不断变化。粤汉铁路修筑后，江与湖基本隔断，沙湖湖面进一步缩小。因此，围绕沙湖湖产特别是淤地所有权问题，屡起纷争，缠讼难断。

沙湖原本是一个界限不很明确的湖泊，至清末，其西北濒临长江一带淤地渐多，曾是官府特别是军队牧马之地，故有马厂存在。其东边和南边是涉及周边村落多个姓氏的私产，湖泊水面也基本上为周边私管业。虽然界限不甚明确，但历年约定俗成，倒也没出现大的争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修筑武青堤后，湖水来源骤减，淤地大增，周边居民自然希望垦种。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以渔为业者难以为继，纷纷上岸，并拒缴课税。经官府调查讯问，各帮（沙湖业户在清代曾以居住地域不同分为四帮，是由共推的一个总业首和四个帮首或称帮头共管的松散管理架构。四帮为上帮、中帮、下中帮和下帮。民初全湖总业首为黄运太，四帮帮首分别是许仁山、张大本、张大兴、祁松林）曾表示不再下湖捕鱼，情愿将湖充公。官府则要求各业户结清以前

积欠，以后湖地招垦，各户不得加以阻拦，亦不得私自开垦。因为产权复杂，利害关系不易厘清，此事不了了之。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时局动荡，不少档案被毁，业户流离，加上原本淤地就存争议，使得有的成无主之地，有的被收为官产。时局安定后，别有用心者更以各种手段巧取豪夺，于是争议和矛盾迅速加剧。

最早是1914年3月，沙湖（讼词多称余家湖，亦有称沙湖，以下除少数需称余家湖外，一般通称沙湖）业主黄运太、许仁山、张广洪、熊小欢、王毛头、周景臣、张大兴等出面，代表沙湖190余户（后增加到207户）向武昌县署起诉嘉鱼县人房逊庵（前清生员）勾结曾任前清武昌粮书的周吉昌（后追加梅春亭，梅与湖权有份，但与周勾结，企图多占）舞弊营私，伪造粮册、印契，设立渔业公司，企图夺产。房、周又与“赌痞”张成炳父子招汉沔渔户下湖捕鱼，与原业主有酿成械斗之势。房某之所以涉案，亦与原告有关。原来此前原告曾与张怀仁因小沙湖（该湖因修筑粤汉铁路与沙湖主体完全分离）发生讼案，请房逊庵拟讼词，由此房知悉沙湖产权问题。当时，张怀仁将小沙

湖占垦数十亩，原告欲通过官司夺回产业。房逊庵觉得有机可乘，乃勾结周吉昌，企图乘乱谋取私利。3月下旬，武昌县知事正式受理。房逊庵自知理亏，曾隐匿不出。4月初，房逊庵到案，败诉，原告请求将房治罪。后知事将此案转交武昌地方检查所、审判厅继续侦办，房逊庵的企图自然未能得逞。此外，还有外帮渔划下湖捕鱼，迟迟不退，黄运太等又多次吁请武昌县知事派警队驱逐。黄运太等的讼词云：沙湖每年应完渔课（湖业或渔业课税）128两，楚课（田赋）11两，分四帮业户摊完。沙湖系滨湖居民世守之业，从无卖给外帮之事，亦无招雇外人到湖捞取之事，要求县知事捉拿张成炳等，驱逐外帮渔划。县知事则批请原告向江夏地方审判厅起诉。于是，黄运太等又转向江夏地方审判厅起诉。此事未了，接着又有毕万兴等占地栽树盖房，并持有武昌县清理财产公所（由原公益保存会改称，负责保管县属公产）执照。6月，又有梅华炳从武昌县清理财产公所承领武胜门外沙湖边地一段，填土盖屋。武昌县清理财产公所之所以能发租，当然认为此处为官产。另外，胡太昌、张怀仁等强占淤地，亦引起其他湖民不满。

1914年7月，湖民改由张树森领衔，又一次上书武昌县知事，要求县署“派员察勘明确，分别官荒民产，以杜弊端而全赋命”。此后，湖民又以沙湖业首黄运太领衔，禀控县属清理财产公所将沙湖巷船埠至多子碾私自没收，擅发执照批租，胡太昌、张怀仁等强占湖边淤地等。因湖民多次呈请，武昌县公产局于11月7日派员前往勘验，结果认定武胜门外沙湖巷船埠至多子碾一带为马厂官荒。湖民不服，继续上诉。如此一来，湖产案除民间纠纷外，又增加了官私之争。实际上，原告所呈的契约、粮券，只

有张大兴等少数几户，而且年份也不连贯，并不能说明整个沙湖及其周边淤地均归原告所有，所以原告之请求没有得到支持。

其间，湖民还向粤汉铁路督办、总办、专办呈文，认为铁路不仅占地，而且截断湖面，影响渔业，要求按亩给予铁路占地以补偿（此前铁路方面只给予数十元“捞渔小费”补偿），未能如愿。此外，湖民还向清丈局呈文，要求进行清查，确认产权，亦未有结果。

在诉讼过程中，涉嫌强占淤地的胡太昌自称藏有马厂残碑，其可辨识的部分文字，证明沙湖南边多子碾东至游家庙、李家大湾等处，东北至白○桥为界，西至○○家墩北头为界，为抚标马厂范围。原告方认为石碑“残废无稽”，怀疑石碑的真实性。

由于产权不清，沙湖周边淤地被邻近绅民占领殆尽，湖中渔藕也被任意捞挖，与湖份无关者，也乘机侵占。原告则不断上诉，要求保护权利。特别是以张大兴为首的湖民，希望将沙湖尽归民有，而一些承租户如毕万兴、梅华炳等则提出反告，并认为是张树森幕后操纵，企图侵占官产，强占民产。

张树森是与沙湖湖产有份之豪绅，为沙湖业首之一的张大兴之弟。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曾以监生捐广东试用知县，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其为制皮厂收支兼采办员。武昌起义后，曾在湖北都督府任职。1913年，任武汉公渡局经理。1914年，任督办汉冶萍厂矿总局总务处长。1915年，赴湖南任新化厘金征收局局长，一度代理新化县长职。他因为和副总统黎元洪熟识，又担任公职，自然有一般湖民没有的影响力。不过，1915~1916年他在湖南任职，湖案审理并未按照他的意愿进行。

由于在武昌县内诉讼未达目的，原告乃改向省公产处、江汉道、湖北财政厅、湖北巡按使、湖北省省长等处申诉，但依然没有明确结果。

经过约两年的诉讼，沙湖此案并无进展。1916年，湖民开始向更高的官厅和审判机构上诉，如内务部、财政部、平政院。向内务部的上诉，被批回湖北省省长“查核办理”，上诉到财政部被批回湖北官产处“查明秉公办理”。上诉到北京，又被批转回湖北，省长又批到武昌县，历经数年，终无结果。1919年，张大兴、张大本、许仁山最终上诉到平政院，认为省长不公，偏袒湖北营产总局、武昌县知事等，强占民产，被受理。平政院的审理进度也很慢，湖民急不可耐，多次呈文催促。在上诉平政院期间，他们仍向省长上诉，当时的湖北省省长夏寿康以“既经呈诉平政院，自应静候判决”答复。

所谓平政院，是民国北洋政府时期法院组织系统的一部分，主管行政诉讼，负责察理行政官吏之违法不正行为，就行政诉讼及纠弹事件行使审判权。张大兴等的诉状提出了不服湖北方面之有关判决和省长批示的种种理由，主要有这样几点：

一是张大兴等持有雍正年间的红契，以及完纳渔课、楚课的券票，大部分地段标明了界限，既管水，也管土，只有光绪年间二十余年没有契约；二是所谓马厂石碑证据不足信，因为石碑关键处字迹不清，有的地名不在沙湖范围内，怀疑为伪造；三是修筑粤汉铁路时，湘鄂铁路局曾与张大兴等湖民签约补偿，官方也曾承认沙湖官荒只有“三四百方”，其余湖地尽属民有；四是官方也拿不出沙湖西南为马厂的确凿证据，收归官有更无依据等等。因而要求平政院重新审理更正，以保护私有财产。因案情复杂，

又是异地审理，平政院未及时判复，张大兴等又多次催促裁决。

1921年2月，平政院终于有了裁决，要求湖北方面发还与契约相符、与营产碑册不相抵触的部分。要“遴委公正廉明干员，会同武昌县知事，执行发还”。湖民根据平政院的裁决，多次呈请省长、督军要求执行。当年6月，督军王占元曾批复由营产总局（1916年从湖北全省清理官产处划出军产设立）会同武昌县“查照办理”。虽然有了平政院裁决和督军的批示，但具体执行、落实起来依然进展缓慢。1923年10月，督军兼省长萧耀南也曾作出批示，要求武昌县知事会同营产总局妥议划分办法。并云：此案经过多年，真伪已明，应静候解决，不应自由纷争，并令先行制止抢挖。11月，萧督军再次批示：沙湖地方，近因水陆问题，强行挖藕，均有不合，自宜先行制止，实行弹压，免酿巨祸。查此案亟应从根本解决，其他枝节当可迎刃而解。前已会同该县局委员等迅速会同妥议，迄未具复，实属玩延，除令催营产总局外，仰即转知委员等遵照前令办理。到了1924年，湖案仍无进展，营产总局认为是湖民方面没有推选出代表，因而难以接洽。由此看来，湖民方面意见不统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案件没有进展，但因挖藕等而起的纷争仍然不断，像当年8月，周大义就因与张树森相争而上诉，张光煊也因私下约人挖藕而被张大本、许仁山等提告。1925年12月，湖北营产总局决定清丈营产，验明契约，以杜冒领私占。1926年3月20~22日，湖北营产总局局长曾尚武等率警队在武胜门外与湖民发生冲突，殴伤拘捕挖藕湖民多人。湖民方面以许仁山、张大本等为代表，一方面向法院提告，另一方面发出“代电”维权，向社会吁请主持公道。

同时还向督军公署上书，要求查办营产总局局长曾尚武等不法行为。

到了1926年7月北伐军进军湖北时，因局势突变，湖北营产总局曾欲将沙湖抵押，为北洋军筹集军费，遭到湖民强烈反对，为首者曾被拘押陆军审判处。10月，亦即北伐军攻克武昌的当月，张树森以业主身份呈请武汉卫戍司令部保护湖产，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签发布告，明示“物各有主，不能任意强取致滋事端。嗣后如有不法之徒恃强侵害他人所有物者，准该业主呈请依法核办”。此后，湖民内部意见似不完全统一，以张树森等为首者，自然希望利益最大化，全体湖民一致行动。但有所谓“不肖分子”，私自组织团体，向营产处承领，被认为是有损湖民利益，威胁要剥夺其湖民身份。

1927年2月，由许仁山领头呈请国民政府财政部处理该案。4月，财政部准以平政院裁决为依据处理。但因时局动荡，沙湖产权并未厘清，混乱依旧。另外，以张光煊、杨云山等为代表的湖民与张树森等利益不一致，曾向武昌地方法院起诉，认为张树森与其兄张大兴借诉讼之机，哄骗湖民红契，企图霸占湖利，要求其交出红契，并追缴历年非法所得，以保护一般湖民权益。

1928年，武汉时局基本安定。时张难先任湖北财政厅厅长，久拖不决的湖案有了转机。当年10月，根据湖北省政府第1114号训令，湖北省政府派员会同武昌县长、湖北公产经理处，组成以县长詹渐逵为主任、湖北公产经理处处长林渊泉及段树滋为委员的划分武昌余家湖官民产业执行委员会，主持共同划分官产与民产工作。经过多次召集湖帮和官、佃各代表商议，提出以下解决方案：以平政院的裁决为依据，提出划分官产和民产条款，确定湖面范围，划分湖水界

址，并经湖帮代表张寿域（张树森之子）、喻祖述、李成芳、张光和4人和湖民代表张光煊等58人盖章签押确认，呈请湖北财政厅备案。经该会与各方商议，确认沙湖（余家湖）业权为沿湖207户（后有增加）共有，此后湖中渔藕利益，归207户共管业。并根据湖民呈请，取消旧时契约合同，另发管业执照。同时编绘该湖水陆全图，标明水面范围、渔户共管陆地界限，并编制湖民户口清册，以杜纠纷。此项结果，分呈湖北省政府、湖北财政厅，分函湖北公产经理处、武昌县公署、湖北高等法院、武昌地方法院，并请省政府转呈武汉政治分会，分别备案。

该会公布沙湖水面划分条款共五条：

一、余家湖（即沙湖）湖水、湖底，划归官厅与湖民207户共有，其水中所有渔藕收益，划归湖民207户共管业。将来湖底涸出时，由官厅将涸出之地发给湖民207户永远承租垦种。

二、自铁路外起至北首湖边港口止，以现时湖水面积，认为余家湖范围，但湖民及其他往来船只，得由铁路桥孔至多子礅，自由出入。

三、依据县志所载，查铁路堤内之沙湖，不在余家湖范围内，应划归官有，但沙湖之鱼，准湖民207户共取，沙湖港北之藕，准由湖民永租。沙湖港南之藕，应由官厅自行发租。

四、小沙湖系另一部分，应划归官有。

五、划分之界标，分为临时界标及永久界标两种，临时界标用长约4尺之木桩，永久界标用洋灰制成方墩。其两种界标工料等费，由官民各半负担，双方派人会同办理。

余家湖陆地划分条款有三条，主要是重新确定课赋数量和田亩数量。

此外，还有《附则》部分，内容为：

沿湖水陆界标之外之官产，此次划分之后，湖民须严守界线，不得争议侵占。惟湖帮张大兴之子张忠耀、许仁山之子许显秀、张大本之子张光银、张树森之侄张忠树、张树森之堂兄张大坤五人，因多年在湖边开垦荒地，半成熟田，兹据张忠耀等屡次声请，维持垦荒利益，愿就北首湖边港内迤西所垦之田，每人各分领一百四十亩，共七百亩，永远承租等语。本会详加查核，尚属可行，决意照准。

这样的处理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了有势力的豪绅地主的既得利益。

1929年1月，划分武昌余家湖官民产业执行委员会发给湖民共同管业执照。从形式上来看，官民产权厘清，207户共享湖利，似乎问题解决了。但实际上，湖民相互间的利益难以平衡，纠纷依然不断。

张难先推进的沙湖案解决办法，既然能达成，应是当时可行的方案。但仍有湖民不满意，特别是张忠耀、许仁山、张大本等人认为利益受损，便以这一处理方案没有按照1927年4月13日财政部的要求，由部选委员两人会同办理，也没有遵照1921年2月平政院的裁决，要起诉张难先以及划分武昌余家湖官民产业执行委员詹渐逵等违法渎职。不过，这一诉讼最后没有进行下去。

1935年，武昌县为继续解决湖产纠纷，决定成立余家湖理监事会。4月，经余家湖湖民代表黄木生等上书武昌县政府，建议在理监事会成立前，由县政府颁发禁令，暂停在湖中采挖，静候理监事会秉公解决，以免发生利害冲突。武昌县政府照准，颁发布告，通令：在理监事会未正式成立前，无论何项人等，均不准擅行挖藕，一经告发或被察觉，定行传案查办，决不宽待。然而，由于湖利长期被一二地痞流氓把持包揽，他们为维护

既得利益，乃多方阻挠破坏，而湖民不明真相，或被煽惑，疑忌丛生，以致该会迟迟不能成立。1935年9月3日，武昌县政府颁发布告，说明成立理监事会的目的，是避免湖利被一二地痞包揽包办，避免纠纷，有利于全体湖民利益，要求尽快成立理监事会。在理监事会选举成立前，任何人不得私行承包，入湖挖藕，违者究办不贷。同时规定被湖民疑忌的张树森父子，不得参选理监事。

1935年9月，余家湖四帮渔业同仁遵照武昌县政府呈奉湖北省政府核准，成立武昌县余家湖湖民共管渔藕理监事会，设立章程。17日在中帮地方依法分帮选举理监事，选得理事9人、监事5人（另有候补理事3人，候补监事1人），共同组成该会，负统一管理本湖渔藕全责。会址设上帮王家窖。

余家湖湖民共管渔藕理监事会人员组成，照顾了四帮利益的平衡。其中，理事为上帮黄木生、翟永生，中帮张大炎、喻祖述、周文广，下中帮万玉元、张光焕，下帮熊宗元、许成春，中帮理事张大炎被推选为理事长（张病逝后，曾由上帮理事黄木生代理）；监事为上帮高顺德，中帮张厚长、杨云山，下中帮祁永盛，下帮梁章生，中帮监事张厚长被推选为监事长。规定任职者要识字，未受过刑事处罚，不吸食鸦片，精神正常等。

该会成立后，于12月21日发出通告称，沙湖官产亦由湖北公产管理处转交该会履行租权或佃权，以收入的三分之二缴纳官租，原租佃户有优先权。

余家湖湖民共管渔藕理监事会成立后，沙湖亦即余家湖讼案基本告一段落。以后虽然历年还存在纠纷，理监事会对沙湖管理也存在诸多困难，但因有官方支持，基本上能够维持其职能，直至解放后沙湖收归公有。

（李焱胜：湖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

明清时期黄陂木兰传说的发展和演变

◇ 张 静

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流传至今已逾千年，留下了徐渭《雌木兰替父从军》、京剧、豫剧等众多的文学艺术经典，同时通过口耳相传流行于民间，在湖北黄陂、河南虞城、安徽亳州、河北完县（今顺平）、陕西延安等地落地生根，与当地的历史文化、民俗信仰等相融合，形成地方传说。2008年，湖北黄陂与河南虞城两地联合申报的木兰传说（I-50）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陕西延安市宝塔区申报的木兰传说进入扩展项目名录。

（一）

黄陂木兰传说历史悠久，遗存丰厚，唐代大诗人杜牧在任黄州刺史期间作《题木兰庙》，将木兰与王昭君相提并论，赞扬两位伟大女性牺牲自我、保家卫国的精神。早期资料中，黄陂有南齐所置的古木兰县、木兰山和木兰庙，但是对木兰传说语焉不详，现在能找到的明确记载黄陂木兰传说的文

献主要是明清时期的，相关资料有：

明嘉靖三十五年《黄陂县志》，林东海、李河图修，俞贡撰。

清康熙五年《黄陂县志》，杨庭蕴纂修。

清同治十年《黄陂县志》，刘昌绪修，徐瀛纂。

清道光小说《木兰从军》（又名《忠孝勇烈奇女传》）。

另有手抄本《木兰宝传》、道教经书《木兰忠烈将军救世真经》《清微木兰将军醮科》，无法确定年代，但根据内容的比对，与上述文献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可见黄陂木兰传说在明清时期处在逐渐丰富发展的过程中，影响日益扩大，地位不断提高，与地方的融合日渐紧密。

历代县志编纂者都对木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木兰的地位在明清时期经历了由民间流传到官方表彰的过程，不断提升。在嘉靖志和康熙志中，编纂者在序言中高度评价了木兰将军，将其与二程（程颐、程颢）并举，但从县志本身来看，其地位无法与二程相提并论，双凤亭享受官方祭祀，康熙志中已有

专门的“二程志”。当地官员文人歌咏木兰的诗歌在嘉靖志中未录，康熙志则收录了张涛、陈天策等人歌咏木兰及其遗迹的诗歌数十首。同治志单设“木兰志”，列于“二程志”后，在序言中说：“木兰将军旧志列诸贞女，以冠节孝之首，可谓知所重矣。然于尊崇之意犹觉歉然，今取旧志所载及各文集所列者汇为一编，以见千古特出，不与寻常等夷云。”到了同治年间，从官方角度来说，木兰的地位已和二程相似。

另外，考察三本县志中木兰遗迹也可看出，祭祀木兰的活动日益受到官方重视。嘉靖志中提到的木兰遗迹有：木兰山、木兰川、大城潭、木兰寺、木兰井、将军凸、木兰将军庙、木兰将军墓，其中提到木兰山有“四方乡民多于此进香”。嘉靖十九年（1540年）巡按御史史褒书委托主簿江文欢重建木兰山下的将军庙（忠烈庙）。康熙志中，遗迹的记录没有大的变动。到了同治志中，增加了三处遗迹：里门奇烈坊、忠孝勇烈坊、承欢祠。里门奇烈坊，由张涛为木兰将军立，今不存。忠孝勇烈坊，在木兰山将军祠前，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张涛奉敕建置，今存。张涛（1554～1618年），字振海，号山是，黄陂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曾任辽东巡抚。承欢祠，在木兰山前祁嗣顶，根据同治志“木兰志”所载《承欢祠记》，由邑人张安庆所写，叙述了乡人感念木兰父母生木兰，为彰显孝道而筹资修建庙宇的过程。同治壬戌年（1862年）秋，张安庆一千人等游木兰山，知祁嗣顶为木兰将军父祁嗣处，有佛龛，“篆内一椽，供奉将军”。张慨然，“将军父祁嗣而生将军，今将军香不绝，不闻有壶酒双蹄为将军父母奠者”，请求“为将军父母建一祠以慰将军孝思乎”。在乡人的支持下，是年十月动工，至腊月告

成，“正殿一楹中奉将军父母像，将军侧坐，两童侍焉左右。两廊，一奉从军七将位，一作马房，基接古佛殿。”祁嗣顶为木兰山三座山峰之一，传说为木兰父母祁嗣生木兰之地，后来兴建庙宇群也命名为祁嗣顶，20世纪60年代被拆毁，今为微波站。

（二）

明清时期，木兰故事也日益丰富生动。嘉靖志中关于木兰故事的记载有两处，一是中卷“乡贤·贞节”有“木兰”词条：“木兰，本县朱氏女，名木兰，假男子代父西征。然不著何代人，据古乐府有可汗语，考史惟唐太宗自称天可汗，疑即此时人也。终身为未适，见古乐府并杜牧之、刘后村诗。”二是在卷三“艺文”中邑人潘子民的《木兰将军》：

唐时本县淠源乡东大活村民朱氏，名隶兵籍，役属西征，其女朱氏以父老弟幼不能前往，君上之名又不敢违，奋然自誓，脱女妆而着男服，弃织纴而事干戈，偕众往西征剿，勤兵十有二年，百战百胜，军中号木兰将军，致使贼虏荡扫，唐室奠安。朱氏之力居多，捷报可汗，策勋纪功，大赐赏劳，问朱氏所欲，对曰：“不用为尚书郎，但愿还故乡。”

在张涛万历三十七年的奏疏中则说：“有湖广省黄州府黄陂县木兰山，乃真武修炼之所。唐节度使朱异家于其下，其女代父出征，功封木兰将军，启建祠宇于其上，并立真武庙，貌世远年湮香火颓废。”距嘉靖志成书不过50多年，黄陂木兰传说又有所发展，出现了木兰父亲的名字“朱异”，为唐朝节度使，木兰家在木兰山下，功封“木兰将军”，山上有祠宇纪念。中国历史上名为朱异的有两人，一为南朝梁大臣朱异

(483~549年)，字彦和，吴郡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二为三国时期吴国将领朱异（？~257年），字季文，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此二人与张涛所说无法对应，暂时未找到对应的历史原型。

从以上三条记载分析，木兰姓朱，黄陂人，女扮男装代父西征的说法是一致的，但是木兰生活的时代、家世、出生地和姓名等信息则有差异。“木兰”词条说明是从古乐府中有“可汗”一词而推断为唐太宗时期，潘子民和张涛则直接说是唐时人；张涛点名木兰父亲为唐节度使朱异，出生于木兰山下，潘子民说木兰出生地“潏源乡东大活村”；“木兰”词条说“名木兰”，但是潘子民说“军中号木兰将军”，张涛说“功封木兰将军”，可见朱氏女的名字不一定是木兰，更有可能只是名号，后逐渐演变为其名。

康熙志中关于木兰的材料明显增多，在“艺文志”中录有十多篇诗文游记，其中邑人王霁的《木兰将军传》提供了黄陂木兰传说较为丰富的信息，开头明确点明了木兰的家室：“木兰将军，大唐初黄人也，黄西陵治北六十里许，名山曰木兰山。乔峻雄丽，胜难悉状，世传敦义朱公宅其阳，灵和攸翠，淑媛笃生，因名以纪事，少秉性贞烈。”王霁为辛丑年（1541年）沈坤榜进士，见任四川保宁府知府，其文中提到了木兰墓和祠的相关情况：“今兰麓遗冢犹存，国初闻盗窃，发风雷卫止，冢旁有祠，乡人岁秩祀以志不忘予。”且在文末说明所记载的来源：“童蒙时闻诸母训，敬而信之，自后历历考据，颇得其实，景行淑节，特立传以阐幽云。”可见当时黄陂当地已经有讲述木兰将军故事的传统，在木兰墓和将军庙有了固定的祭祀活动，并成为当地的一个信仰中心。宜兴人

陈天策的《游木兰山记》中也记载：“今古墓俨然，山麓里人岁操壶酒豚蹄以奠其为。”

（三）

同治志为木兰单独做“木兰志”，包括序、奏疏、传记、诗文等资料二十余篇，其中部分在康熙志中可见，也有一些新的资料，其中《木兰古传》是迄今黄陂木兰传说较早的完整文本，名为“古传”，但却无任何信息证明其古老，作者为“佚名”。开头详细交代了木兰的出生：

木兰将军，黄郡西陵人也，姓朱，父寿甫，母赵氏，无子，祷于建明山。赵氏梦山神抱一女入室，曰：“此将星也，三国未坠诸葛营中，自土宇分裂，三辰失形，久隐此山，今付汝家。黄有四泽，泽气多女，故不能男。后二十年当显于世。”遂有娠，如期生女，是为木兰。寿甫长男全思歿于军，少男孺生尚幼。

中间大段是木兰成长和从军的内容，文末交代了木兰返乡后的结局：

木兰卸戎服，理旧装，自是承欢膝下，孝敬弗衰，寿九十以疾终于家，冢在木兰山后，上有一冢，即将军墓，下一冢乃葬衣冠处，旧有碑碣。

此文本与当代流传的传说相比，主要不同点在于木兰兄弟的姓名和她在军中七位属将的姓名当代不见流传，但是在木兰山三元宫所藏《木兰忠烈将军救世真经》手抄本中可见，名字完全一致，张安庆的《承欢祠记》中也提到木兰七位属将，可见当时的传说、遗迹和文献中应该有这七位属将，这一文本应该较为古老且曾经广泛流传。除此之外，其余情节在当代均有流传，木兰父母无子祷于建明山的情节，为当今木兰山祁嗣

顶的由来；木兰为将星投胎下凡，由山神送子，在当代还有异文为真武祖师送子；木兰参加的是唐初李靖与突厥的战斗；文中提到“下一冢乃葬衣冠处”，当代木兰墓周边村民仍然认为木兰墓有真假，假的为衣冠冢，真的在附近的田地里。《木兰古传》的主要情节和众多细节与当今流传的木兰传说是一致的。

（四）

除了县志之外，木兰山庙宇宫观及周边村落还存有一些“老书”，现可见磨针涧所藏刻本《木兰从军》复印件，此书在木兰山一带颇为流行，又名《忠孝勇烈奇女传》（以下简称《奇女传》），不题撰人，四卷三十二回。根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和《古本小说集成·忠孝勇烈奇女传·前言》的记载，现藏较早的版本是光绪四年（1878年）的道生堂本和常州乐善堂本，之后刻本甚多，现在比较容易接触的版本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京都养真仙苑藏版本为底本，该版本跋的落款是“大清道光七年小阳月，上浣之吉淦川周淙敬撰”，可见此书成于道光七年（1827年）或稍前。该书作者应为黄陂人，小说展现的生活背景以黄陂为基础，如一系列的地名：木兰山、大悟山、西寺、双龙镇等。小说结尾有一段话：“本朝康熙年间，大悟山又出一僧，名冲元和尚……木兰山出一道……二公皆与四川巡抚姚公为密友。”大悟山在黄陂县北120里，上有寺，昔洪山僧悟道于此。姚公是姚缔虞，黄陂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授四川巡抚。这些细节应该只有同乡人或者长期在当地生活的人才熟悉。该书以黄陂木兰传说为基础，融合了说唐系列小说、大悟山丧吾和

尚传说、木兰山铁冠道人传说、木兰山狐精传说等不同文本演绎而成。

与县志中的记载不同，《木兰从军》小说内容非常丰富，增加了很多重要的人物和情节，书中写道：

隋代湖广黄州府西陵县双龙镇人朱若虚，与李靖、尉迟恭交好，后生二子，天锡与天禄。天禄、杨桂贞夫妇年过三十无子，祷于木兰山而生木兰。木兰得祖父、丧吾和尚、铁冠道人真传，文武兼备，但与木兰山狐精胡秉池一家结仇，争斗不休。唐太宗降诏讨伐突厥，天禄病重，木兰代父从军，因尉迟恭、李靖的提拔保举，被封为武昭将军；在五台山，得靖松道人所赠的义孝明驼；征战十二年，木兰立下赫赫战功；凯旋而还，官拜兵部左侍郎，木兰表明女身，被封为武昭公主，回乡笃志修行。太宗后来听信张昌宗、许敬宗谗言，谓致乱必由武姓，即武昭将军木兰。木兰为示忠贞之心，剖腹剜心，以明心迹。太宗大悔，封木兰为贞烈公主，题其坊“忠孝勇烈”，葬于木兰山下。武则天赐木兰为昭烈后，又赐金书、对联，后来木兰在木兰山屡屡显圣，香火不绝。

书中增加了很多之前文本没有的情节，这些情节至今仍在木兰山一带流传，其中剖腹剜心情节又关联了仙合店、剖腹台、一里河等多个文化遗迹和地名。该书的主要情节与木兰山所藏《木兰宝传》内容基本相同，宝传疑为“宝卷”，讲唱体，当地也有唱木兰将军的善书，现在难以断定《奇女传》一书中大量新的情节是作者所创，还是从民间传说中借鉴。但肯定的是，清道光年间，黄陂木兰传说的情节已经非常丰富，与现在民间流传的传说大体相同，且与地名和景观相融合，形成传说风物和文化遗迹。

（张静：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湖北三老”与湖北现代美术教育

◇ 李瑞洪 张明建

2020年是湖北美术学院百年校庆，由蒋兰圃、唐义精、徐子珩创办的武昌美术学校，从1920年走到今天，由最初的十几个学生发展到现在拥有藏龙岛、昙华林两个校区，各学历层次在校生7600余人的规模。学校经历了现代美术教育整个发展过程，其间自有许多故事，而“湖北三老”是不得不提的。

“湖北三老”指活跃在近代画坛的三位老艺术家张肇铭、王霞宙、张振铎。2009年，湖北美术馆曾举办“三老万象”画展，声势很大，一时关于“三老重聚”的报道扑面而来。往前追溯，1963年，“三老”在武汉展览馆举办过联展，这是“三老”的作品第一次集中呈现给观众。著名画家赵合俦先生为画展作了序《丹青点泼花解语 彩笔纵横妙趣生》，文中最后一段写到：“总观三老画展，真是生气勃勃，有深厚的生活气息，画家们以自己独特的风格体现了时代精

神，因而博得了观众的好评。我以最美好的祝愿，愿三老的花苑开得更鲜艳美丽，繁荣昌盛。”此文当时见了报，并登载了“三老”作画的合影。那是关于“三老”最早的文字记载。

“三老”并提，是人们对三位老艺术家艺术成就的肯定，是对他们在湖北影响力的肯定。其实支撑“湖北三老”地位的，还有他们在湖北现代美术教育中的地位，这是不可缺少的。他们是现代美术教育的接受者、践行者和传播者。“三老”在湖北现代美术教育的活动，从时间跨度看，可从1923年到1989年：张肇铭先生1923年从北平美专毕业，回汉后应邀到武昌美专代课；王霞宙先生1924年从南京美专毕业后进入武昌美专；张振铎先生1927年自上海美专毕业，一直从事美术教育，1947年应聘进入武昌艺专，1989年去世。从学校沿革看，1923年武昌美术学校改名为武昌美

术专门学校（简称“武昌美专”），成为高等美术学校。以后学校历经改制，战时迁川，战后返汉，交中原大学，组建中原大学文艺学院。其后经数次分合调整，一部分历经中南文艺学院美术系、中南美专；一部分并入湖北省教育学院艺术科，历经华中师范学院图画系，于1958年与中南美专留汉部分合并成为湖北艺术学院美术系，到1985年从湖北艺术学院独立出来，成立今天的湖北美术学院。“三老”参与了这整个过程。回顾梳理，“湖北三老”与湖北现代美术教育的关系便清晰地呈现出来。

（一）

张肇铭（1897～1976年），1920年考入北平美专，得陈师曾、姚茫父、王梦白亲授。1923年，张肇铭毕业回汉，在国立一小任教务主任的同时，受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唐义精之邀，在武昌美专教授美术史。从此，张肇铭这个名字便与这所学校很难分开了。

1923年，改名后的武昌美专学习现代教育方法，引进西方绘画原理，成为全国四所最早的高等美术学校之一。张肇铭是这所高等学校最早的国画教员。

1926年，武昌美专成立校委会，唐义精、张肇铭、王霞宙等五人任主委，参与学校管理。1930年，武昌美专遵照教育部颁布的专科学校规程，改校名为私立武昌艺术专科

学校（简称“武昌艺专”）。改委员制为校长制，重订校董会简章，张肇铭和王霞宙以教员校董的身份成为武昌艺专的创办者之一。

学校改制，唐义精接任校长，校园扩建，教师队伍壮大，学生人数激增，那是武昌艺专发展最好的时期。第二届全国美展在南京展出期间，还专门邀请武昌艺专举办师生画展。

抗战爆发，学校西迁，张肇铭在短暂的军旅生涯后，1939年到四川江津，成为武昌艺专专职的美术教员，是很长时间内唯一的国画老师。1940年，张肇铭取得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的“教授证书”。1942年，担任武昌艺专教务主任，负责学校具体事务。

1944年4月，校长唐义精乘民惠轮赴重庆参加全国美协会议，张肇铭留校主持校务。24日，轮船在重庆小南海触礁沉没，唐义精和兄弟唐一禾以及同船100多人赴难。此后，武昌艺专的校务开始由教务主任张肇铭主持。次年，他正式任武昌艺专校长。



20世纪60年代初，右起：王霞宙、张肇铭、张振铎、闻钧天、吕圣遗、赵合俦等在笔会上合作中国画作品

1945年日本战败，他和姚济之多次由江津返汉，为学校复原奔走。累时一年多，1946年10月，学校全部迁回汉口，租汉口宁波会馆暂充校址，还在赵家条借用徐源泉的房产建了一个分校。

重返武汉的武昌艺专百废待兴。张肇铭请王霞宙、徐松安等回校任教，并聘请了战后留在武汉的张振铎以充实教学力量。

武昌艺专在张肇铭及同仁的努力下，得到保存和发展。回汉后，恢复附属中学，增设了绘画科、师范科。设三年制及五年制艺术教育科（分图工、图音两组）、绘画科（分中国画、西画组），附设高中部及初中部（普通科）。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培养了美术和教育人才。

武昌艺专返汉复原，在许多现代教育文献和艺术史大事记中都有记载。这是张肇铭对武昌艺专的一大贡献。

1949年新中国成立，武昌艺专交中原大学文艺学院，张肇铭在文艺学院任教，教授美术史和透视学。1951年3月，被聘为美术理论教学指导组主任；8月，被聘为美术理论教研組主任。

1953年，中南美术专科学校成立，中南文艺学院美术系并入中南美专。学校逐渐恢复专业的教学秩序，恢复了国画教学。中南美专的领导胡一川、关山月等对专业比较重视，张肇铭被聘为副教授，教授国画、书法，还配有一位叫喻侠夫的助教，偶尔还会和他一起带学生到武昌的小街小巷写生。1957年，张肇铭任国画教研室主任、校工会主席。



20世纪60年代初，王霞宙与学生们合影。一排左起：朱泳莲、王霞宙、潘德广、曹天舒，二排左起：陈立言、庐望明、罗仲文、杨奠安、陈良才、罗镜泉，三排左起：彭志雄、郭方颐、谭演

1957年，中南美专筹备南迁广州，张肇铭调刚成立的武汉美协，被选为首任主席。调离学校后，还经常接受学校布置的教学任务，到湖北艺术学院授课。

（二）

王霞宙（1902～1976年），1924年毕业于南京美专。毕业后和同班同学欧志先一起到武昌美专执教，和张肇铭一起成为武昌美专国画专业的奠基人。1926年，作为校委会五位主委之一管理学校事务。1930年1月，王霞宙也以教员校董的身份成为武昌艺专的创办者。

王霞宙曾入著名国画大师梁公约门下，为纪念老师，将自己的画室取名为“怀约画室”。王霞宙家境殷实，他早年擅长画仕女，有“王美人”之称。他思想极活跃，很积极

地参与社会活动和艺术活动。1927年，以武昌美专教员为主成立的“梅社”，他是创办者之一。“梅社”留下不太多的合作画，有的款识留有“作于怀约画室”的字样，可见怀约画室是“梅社”朋友小聚的场所之一。1935年6月，武汉举办“汉口市美术展览”，当时的《武汉日报》登载王霞宙与油画家龚孟贤合写的《武汉中西画家总评》。抗战开始，他曾到襄樊第五战区从军。

1946年，武昌艺专返汉复原，王霞宙应邀回校执教。他和学校聘请的张振铎、赵合涛、徐松安等一起，缓解了师资缺乏的难题。

1949年，王霞宙到湖北省教育学院执教，后经华中师范学院图画系到湖北艺术学院美术系。这是武昌艺专历史沿革的另一支脉络。

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以极高的热情创作领袖像，却因表现手法受到批评。从那以后，他放弃了人物画的创作，专攻花卉。王

霞宙在艺术上的追求是执着的，他提倡活本所有，画本所无，创作过许多过去少有人表现的山花野卉。1959年建国十周年大型画册上，选登了一幅他创作的《卷丹》。对于艺术创作，他有自己的规划，对笔墨随时代，对题材开拓选择有些具体的想法。他曾向学生宣布“六十变法”，在笔墨的创新、题材的多样化上作些探索、突破。“文革”期间，他数度遭遇噩运，于1976年年初不幸辞世。

王霞宙参与开创湖北的国画教育事业，为本土培养国画人才，留下无数精彩的作品。人们不会忘记他。

（三）

张振铎（1908～1989年），1924年入上海美专初师科，1926年入上海美专高师科学习，1927年毕业于上海美专艺教系（首届），得经亨颐、吕凤子、潘天寿等名师指教。1932年任上海新华艺专中国画教授，4月，与潘天寿等组成“白社”画会。1943年春，在重庆举办画展后，他与关山月、赵望云等结伴赴祁连山暨敦煌写生、临摹，5月他们在西安办联展，10月在兰州办个展，筹措经费，年底才回到四川璧山。一路在名川大山写生，到艺术宝库临摹，这次以赵望云提出的“朝圣”之旅，在张振铎的艺术道路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46年，张振铎任重庆西南美专绘画科主任、中国画教授。从上海美专毕业后，他一直从事美术教育工作。

1947年，张振铎由四川返浙江，途经武汉，探望同乡朱楚



1977年9月，张振铎先生（中）为学生示范教学

辛时，巧遇昆明国立艺专的学生曾竹冰、李际科等，一连几日相约相聚，相见恨晚，不忍分离。曾竹冰是老通城老板曾厚诚之女，张振铎与她在江城结缘，因此留在了武汉，也成为了一段佳话。同年，受武昌艺专校长张肇铭之聘，任艺专教授。从这一年起，他与湖北的美术和美术教育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9年，张振铎任武汉市人民教育馆干事。此后，他离开学校和专业美术有4年时间，但不断有作品发表并参加美展。

1954年，张振铎调华中师范学院任图画系中国画教授。在其后的35年当中，他完全投身于湖北美术教育事业，先后担任华中师范学院、湖北艺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中国画教授、系主任、副院长。

1985年，他和与武昌艺专渊源极深、感情极深的杨立光联名打报告（杨立光上高中就在武昌艺专，江津时在武昌艺专毕业。夫人是蒋兰圃的侄女，也是武昌艺专毕业），提出将湖北艺术学院美术系独立出来，成立湖北美术学院。很幸运，这个报告得到批准，才有了今天的湖北美术学院。写到这里，不难看到，从1923年“武昌美术学校”改名“武昌美术专门学校”，成为全国最早的三所美术学院之一，到1985年成立的“湖北美术学院”，成为全国八大美术院校之一，“湖北三老”都是这所学校发展历程中很重要的参与者，当然也是湖北现代美术教育很有力的推动者。张振铎先生一生有很多精彩的经历，如和潘天寿等组成“白社”，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中有着重要的位置；1943年与关山月夫妇、赵望云等结伴敦煌写生；多所院校的任教经历，留下许多精彩的作品。而1985年促成湖北美术学院的成立，一定是他在湖北美术教育方面的一大贡献。

（四）

武昌艺专在很长时间里，拥有许多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教师。和西画比较，国画的师资就弱许多。回汉复原后，张肇铭聘请王霞宙、张振铎、欧志先、赵合涛、徐松安、侯东谷等到艺专任教。这在当时或许是因缺乏师资的不得已之举。因这些教师大都擅长花鸟画，因此对湖北画坛造成很长时间的影 响。“三老”以花卉见长，传统功底深厚，他们分别毕业于北京、上海、南京三地的美术院校，不同地域的影响，使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融三地所长，对湖北美术的发展是幸事。著名画家鲁慕迅先生谈及湖北的画风时说过：“湖北的画风是开放性的。”形成这个开放性的原因与湖北的地理位置有关，与“三老”受教育的背景和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有关。湖北的花鸟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呈现出很强的整体实力。在著名美术理论家阮璞的回忆文字中，谈到20世纪50年代“三老”的一次出外交流，他用了个很有意思的词——“远征”。著名画家邵声朗当时在中央美术学院就读，亲睹了“三老”在那里的示范作画。他们作画时谈笑风生，胸有成竹，实力尽显，很让湖北露了把脸。1956年9月，关山月等武汉26位画家合作的大型国画“百花齐放”，也留下了一段佳话。

湖北现代美术教育成就蔚为可观，在美术、雕塑、工艺美术、教育师资等方面都培养了许多人才，罗列起来会有一串长长的名单。本文写“三老”，便仅从国画方面和曾得到“三老”教益的学生来叙述。

武昌艺专在重庆江津办学期间，就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一些在江津完成学业的

学生，都磨炼出了很深厚的传统功底，战时的江津，潜心研究艺术的氛围总觉得值得探讨。国画最有成就的当数长安画派康师尧，油画则有刘国枢、杨立光。回汉复原后，最有成就的学生是1949年在武昌艺专毕业的汤文选，他创作的《婆媳上冬学》《我一定要入社》等影响极大，以后以大写意花鸟著名。还有中原大学文艺学院毕业的周韶华、张善平、鲁慕迅等。周韶华曾因举办“大河寻源画展”“世纪风画展”“六十年艺术探索展”和发表《全方位观照论》《横向移植与隔代遗传论》等为世人所注目。张善平所作历史画《收回英租界》《声援二七大罢工》《攻打麻城》等获湖北省暨武汉市美术展一等奖，分别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武汉二七纪念馆等单位收藏。鲁慕迅终生致力于中国画的创作与美术理论研究，兼攻书法、诗词，其对中国画探索创新的成果，推动了中国画的发展，为中国当代绘画代表性画家之一。湖北省教育学院毕业的有冯今松、魏杨等。冯今松擅写意花鸟，他的画已经形成“冯记水墨”的独特风格，画风清新、秀逸，别具一格，《高秋图》获第六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中南美专时期有汤清海、乐建文等。汤清海在武汉毕业，曾任齐白石美术馆馆长。乐建文在武汉入学，广州毕业留校任教，以后任湖北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湖北美术学院时期有陈立言、贺飞白等。陈立言以《秋忙》《新仓》在全国获奖而初露头角，后花二十余年精心创作《中国历代文星图赞》，将上自左丘明、孔子，下迄蔡元培、毛泽东的106位古今杰出人物，作为“文星”代表，以“图赞”形式呈现出来，2010年以“画境文心”为名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贺飞白以《桑梓情》获全国美展银奖。湖北美术学院时期有唐大康、刘一原等，成为湖北

美术学院第一届研究生，唐大康英年早逝，刘一原以学习传统开始，以心象山水闻名。这些学生现在还活跃在画坛，他们构成的现代湖北美术界的整体形象，是由“三老”及后续者的努力而成就的，现在继续影响着湖北的美术和美术教育。

1975年，湖北艺术学院美术系恢复花鸟画教学，著名画家邵声朗、陈立言专程到张肇铭和王霞宙家中，请他们作了批课徒画稿，作教学之用。这些画稿在2020年9月湖北美术学院老校区举办的“资此德范，涵养育美——‘湖北三老’课徒稿及史料回顾展”中便能看到。展览中还有一批20世纪40年代课徒画稿，由武昌艺专学生、曾任杭美副书记的李家桢的女儿捐赠，那是张肇铭在江津为其母亲授课时所作。这些颇有年代感的画稿和史料，展现了许多画外的东西，记录了湖北美术教育发展的某个瞬间。慢慢看，细细品，会获益不浅。

（李瑞洪：武汉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汤湖美术馆副馆长；张明建：张肇铭长孙，文史学者）